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1927-1937)：以報刊雜誌為主的討論

Female Ball Game Players in Eastern China (1927-1937): A Discussion Based on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of That Period

doi:10.6353/BIMHAS.199912.0057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32), 1999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32), 1999

作者/Author：游鑑明(Chien-Ming Yu)

頁數/Page：57-12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9/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353/BIMHAS.199912.005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 (1927-1937)： 以報刊雜誌為主的討論

游鑑明

摘要

1927-1937 年間，由於國民政府大力倡導體育活動，體育界對「體育救國」的觀念多方鼓吹，運動競賽顯著增加，女子球賽之頻繁前所未見。其中重要球賽因多數集中在華東，上海女球隊的表現又是全國之冠，因此本文以此期華東地區的女球員為例，並就資料較豐富的當代期刊報紙進行研究。首先從組織女子球隊與訓練女球員這兩方面著手探討，藉此瞭解成為女球員的歷程；其次根據各類型球賽，綜觀女球員如何馳聘球場展開球員生涯；其三探討球賽對女球員公、私領域的影響，並進一步觀照大眾的反映；最後從不同觀眾心目中的女球員形象，展現女球員的多種面貌。本文是透過近代女子體育瞭解女球員的產生、發展及其動向，不強調女子體能教育與女球員的關係，而是重視球賽對成為女球員或已是女球員的影響，還有社會大眾與女球員的互動，並呈現其間的社會與文化意涵；此外，兼論當時的女性形象與兩性問題。總之，處在女權思潮蓬勃、自主解放意識高漲和都市新女性當道的時代，女球員能超越性別界限，與異性分享和共爭球場；同時有機會藉球員的角色反映社會時尚。儘管女球員的表現毀譽參半，但母可否認的是，在人為塑造和時尚所趨下她們獨領風騷，且是這個時代重要的社會新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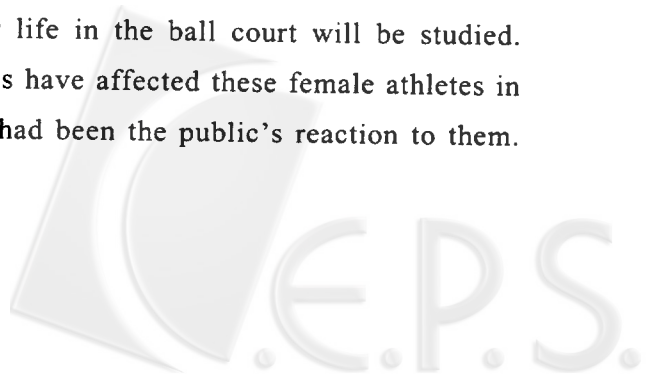
關鍵詞：女球員、籃球、排球、男女共賽、球賽

Female Ball Game Players in Eastern China (1927-1937): A Discussion Based on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of That Period

Yu Chien-ming

Abstract

Between 1927 and 1937,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strong promotion of athletic activities and athletic circles' advocacy of the concept of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Sports"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thletic competitions. Ball game competitions among female athletes also reached unprecedented frequency. Because most of the ball game competitions were held in Eastern China, with the Shanghai women's team showing the national best performance, this paper will cite the case of women athletes in Eastern China using relatively abundant data obtained from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of that period. Probes will be centered on two areas: Organization of female teams and the training of women athletes. This allows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y became ball game players. Based on the various types of ball games, how these women athletes went about with their life in the ball court will be studied. Probes will be made on how ball games have affected these female athletes in their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and what had been the public's reaction to them.



Finally, by studying the images of these female athletes in the minds of spectators, this paper will showcase the various facets of women athletes of that time. This paper will look into how women athletes were generated, and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ientation through a study of modern-period female athletic education. Stress will not be mad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female athletes. Instead, emphasis will be on the effects of ball game competitions o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female ball game athlete and on those who were already accomplished athletes. The ques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eneral public and female athletes will also be raised, including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Side issues like women's image and gender relationship will also be touched upon. In summary, at a time of the rise of women's rights, self-determination and liberation, as well as the ascent of the new urban women, female athletes were able to transcend the barriers of gender, thus sharing honors and competing with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for ball courts. They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ed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rough their role as female ball game players. Although their performances showed both extremes,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rough image shaping and trends, they were in a sense unique. In fact, they represented a new and important social group in that period of time.

Key words: Female ball game players, basketball, volleyball, mixed-gender competitions, ball game competitions



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 (1927-1937)： 以報刊雜誌為主的討論*

游鑑明**

- 一、前言
- 二、女球員的產生
- 三、女球員馳騁球場
- 四、球賽對女球員與大眾的影響
- 五、社會大眾心目中的女球員
- 六、結論

一、前言

中國的球類運動始於上古時期，當時的球類活動是踢足球（即蹴鞠或踢鞠），主要用在軍事訓練上，其後才逐漸流傳至民間，成為社會的娛樂活動，也因此有女性加入了這項活動。除了踢足球之外，傳統女性喜愛的球類還包括馬球、步打球和捶丸等。¹至於喜愛球類運動的女性有閨閣女性、也

* 本文係國科會補助計畫，並承該會贊助赴中國大陸蒐集資料，深表感激。本文初稿之修訂，得助於巫仁恕、高彥頤(Dorothy Ko)、賴惠敏諸先生的指教。二稿完成曾發表於 1999 年 7 月 15 日本所學術討論會，會中蒙評論人張玉法先生與呂芳上、沈松橋、許雪姬、張力、黃克武、葉其忠等先生斧正。其間又獲兩位匿名審查人與所外朋友提供寶貴建議，同仁謝國興先生惠示資料，特在此一併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¹ 馬球盛行於唐代，受身體條件限制，女子打球時多數是騎驢而不是騎馬；而步打球是從馬球演變而來的運動，直接拿著球桿徒步打球。步打球至宋朝發展成捶丸運動，亦即用

有宮女和妓女，從歷代文人的詩詞或戲曲小說中即可看到這群女性戲球的場景，而一般文物圖像也不乏女子玩球的刻畫。²惟儘管傳統時代便有女性熱愛球類活動，與近代女子球類運動相較實大異其趣，傳統女性打球純為消遣或逗趣，近代女性打球不僅具娛樂意味，且充滿競爭氣氛，同時，球技精良的女性有機會被選為球員參加球賽。因此近代女子球類運動的複雜性不言而喻。

近代球類運動於 19 世紀末期由西洋傳教士引進，並在校園中流傳。起初僅有少部分男學生利用課餘進行這項運動，迨至球類運動成為體育正課，加以球賽及大型運動會中列有賽球項目之後，有興趣打球的學生漸增，校園中也出現專務球賽的學生，「球員」一詞遂不脛而走。至於女子球類運動因發展較遲，其推動的過程遠不及男子球運。儘管民初已有女學生從事球運，也有校內與校際間的女子球賽，但這類球賽多以聯誼與表演方式呈現，即使大型運動會也不曾有女子球類競賽，例如 1923-1924 年間，遠東運動會（以下簡稱「遠運」）與全國運動會（以下簡稱「全運」）設有這項賽程，卻列在表演項目內。³

二〇年代後期以降，由於國民政府對體育活動的大力倡導；加以此期受日本侵華事件的刺激，清末以來主導著近代體育發展的「體育救國」觀念不斷被體育界強調，運動競賽顯著倍增，而女子球賽也達到前所未見的頻繁；再者，此期的女子球賽採錦標競賽，促使原是球場邊緣的女學生球員得以大顯身手，也帶動更多的女學生投入球賽。⁴無疑的，這個時代的體育風

棍打球，類似今日的高爾夫球。任海，《中國古代體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二版），頁 25-31；王其慧、李寧，《中外體育史》（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87-88。

² 劉秉果，《中國古代體育史話》（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頁 15-23；王其慧、李寧，《中外體育史》，頁 87-119。

³ 這段時期的三屆「全運」全在華東地區舉行，即在杭州（1930年）、南京（1933年）和上海（1935年）等三地；除 1930 年的籃、排球賽錦標未為華東區代表所獲之外，其餘兩屆的冠軍均屬華東，並由上海市球隊奪標。

⁴ 有關女子體育救國的論述詳見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新史學》卷 7 期 4（1996年 12月），頁 131-144。

氣使女球員成爲頗具吸引力的角色，而這也是觸發我研究這群女性的原因所在，本文並擬以四個方向進行分析。由於球員的產生不是僅憑藉個人球技，尚需有各種條件的配合，本文首先要從組織女子球隊與訓練女球員這兩方面著手探討，藉此瞭解成爲女球員的歷程；其次就各類型球賽，綜觀女球員如何馳騁球場展開球員生涯。

對女學生球員言，球員生涯相當短暫，但意義卻非凡，女球員除從球賽中改進球技之外，道德規範與生活等連帶著受到影響。此外，球賽是公開演出的活動，女球員與觀衆形成互動關係，球賽的過程與女球員的表現也衝擊著觀衆。更重要的是，儘管女球員這個新的社會群體是在體育政策與民族思潮激盪下建構而出，並以運動員的形象出現在大衆眼前，但社會大衆的觀賞角度並不一致，經由報刊雜誌再現的女球員形象自然多樣而複雜；有趣的是，這種由媒體塑造的女球員形象也引導觀衆的態度和對她們的觀看。爲瞭解這層層現象，本文接著要探討的是，球賽對女球員公、私領域的影響，並進一步觀照大衆的反映，尤其是在觀衆中占多數的學生；最後將透過不同觀衆心目中的女球員形象，展現女球員的多種面貌。

根據上述四個方向，本文試圖揭示這個時期女球員的活動，以填補這段空白的歷史，並期望爲性別議題與女性研究提供思考方向。以性別議題言，分從球員、體育專家與觀衆三者進行檢視，一方面審視男女兩性各以何種態度看待女子球賽與女球員，也觀察女球員如何看待男球員與大衆？另一方面討論兩性關係是否因球賽活動而變化？若有變化，兩者的關係是衝突抑是和諧？不過，本文僅論述球賽所帶來的兩性互動，而不比較二者的個別差異。以女性研究言，女球員是以球技出衆而成爲風頭人物，有別於傳統的才女，其間的差別何在？女球員是代表學校、地方或國家爭取錦標，她們必須棄私爲公，不僅在公領域活動，也需爲公衆團體負責任。然而處在女權思潮蓬勃、自主解放意識高漲以及都市新女性當道的二、三〇年代，女球員顯然不會限於運動員的角色，僅關懷球賽勝敗，她們是否藉這個角色更凸顯自我以回應時代，並以她們的形象爲社會塑造另類新女性，是另一值得探究的課題。

總之，本文是透過近代女子體育瞭解女球員的產生、發展及其動向，不強調女子體能教育與女球員的關係，而是重視球賽對成爲女球員或已是女球員的影響，還有社會大眾與女球員的互動，並呈現其間的社會與文化意涵；同時兼論當時的女性形象與兩性問題。爲確實掌握此期女球員的活動，我選擇華東地區⁵的女球員爲論題，蓋因這段時期重要的球賽大致集中在華東，而上海女球隊的表現又是全國之冠。不過必須釐清的是，籃、排球運動是當時較普及的球類運動，我所著眼的便是從事這兩項運動的球員；另外，此期的女球員主要來自學校，儘管有學制與學級之別，但因普通學校與體育專科學校的球員區隔不大，同時球賽也多半無這類限制，本文擬合併論述，並偏重球運風氣較盛、明星女球員較多的上海。

至於時間的斷限，始自 1927 年，係因這一年之後華東地區的女子球賽開始轉型，迄於 1937 年，則與中日戰起、球賽活動不同往昔有關。有關資料的運用，本文是以報紙、校刊、婦女雜誌和體育期刊爲主體，另參閱其他相關的書籍。需要說明的是，爲引起大眾對球賽與球員的關注，報紙對這部分的記載不免誇張，其中女學生賽球又是衆所矚目的新聞，渲染程度更加深化；但這也體現當時球賽報導文化的特性，因此本文不擬對這類敘述添加過多修飾。另外，呈現女球員的聲音原是本文另一探討重點，但因這個時期女球員的生涯有限，目前未能覓得適當的受訪人，惟有從文獻資料探証並略著墨。由於本文是開拓性工作，尙有不少相關課題待探索，例如球場的興建、規模、票價，以及球賽與學校體育、學生健康、國族思想的關係等，這些問題擬另文處理，並與其他運動合併討論。

二、女球員的產生

近代中國體育建立初期，採非正規的教學方式，以課外遊戲或課外活

⁵ 當時運動會分成東北、華北、華南、華中、華東等五區，本文指涉的「華東地區」即根據區域運動會的畫分方式。至於華東所涵蓋的省份是江蘇、浙江兩地。

動的形式逐步引導學生運動。⁶而女學生因多數纏足，行動欠便，體育教學更難推動，因此學校多採輕便的運動方式，如體操、遊戲或舞蹈等吸引女學生。⁷此外，校舍幅地不廣，也造成體育教學的不便，以上海聖瑪利亞女校為例，早期該校的設施相當簡陋，除教室、寢室之外，其他均付諸闕如，天晴時學生還可在堂前草地運動，天雨時因無運動場地，只有蜷居室內。⁸不過，隨著體育活動漸受重視，有的學校於體育課程中增列田徑或球類運動，部分女校也以放足女學生日增以及校舍擴充，開始設置這兩項運動，以改進體育教學的內容。⁹其中籃、排球運動較能為學校和學生所接受，一方面是這兩項運動是合於經濟原則的運動，既無需太多的設備，占地又不廣，大多數學校能開闢場地供學生使用；另一方面是與其他運動相較，無論在技術或配備上，籃、排球是男女老少咸宜的運動。另外，為倡導女子體育，這種適合女性的運動得到不少女校的支持，有的學校鼓勵學生在課餘打球，也有學校舉辦班際或師生球賽，藉此提高女學生打球的興趣。更重要的是，打球的風氣在三〇年代達到高潮，有的地區有「打體育」的說法。¹⁰

華東地區的女子球運是由教會學校首開其端，1916年上海女青年會體育師範學校最早有女子籃球活動，其後這項運動逐漸在女校流傳。¹¹當學校興起球類比賽後，有意參加球賽的女學生便相約組隊練球，這些球隊多半產生自一個班級或由數個班級學生混合而成，有的球隊更排定練球時間，讓練球活動正規化。1918年上海中西女塾即有三支以這種方式組成的籃球隊，

⁶ 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中國體育史學會編，《中國近代體育史》（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89），頁63。

⁷ 高梓、張匯蘭指出此期的體育是以「活動血脈強壯筋骨」為目標未對學生做太多的要求。高梓、張匯蘭，〈中國女子體育問題〉，《科學的中國》卷2期8（1933年10月），頁20。

⁸ 上海市檔案館藏，Q135-3-138，張嫻如，〈十年前拾零〉，《聖瑪利亞女校五十週紀念特刊》（1931年），頁9。

⁹ 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新史學》，頁124-125。

¹⁰ 由於當時「體育即打球」的現象極為普遍，因此有此一說。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體育史簡編》（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81），頁116。

¹¹ 董怡和，〈舊中國的籃球運動〉，《體育史料》第5輯（1981年12月），頁9。

這些球隊還自訂每週一至週三午後四點半到五點為練球時間。¹²此外，上海啓明女校則鼓勵學生課後打球，將學生分甲、乙二組，以交相角逐。¹³嚴格而言，此期華東地區具規模的球隊並不多，即使有球隊已粗具規模，比賽的對象多限於校內同學與教職員，若外出比賽，也屬表演性質或友誼賽。1916年上海女子蠶業學校和愛國女校在江蘇省校際聯合運動會中表演網球和籃球，是華東地區最早的女子球類公開表演賽。¹⁴1923年上海裨文和民立兩女校曾以華東區代表為名，與華南隊一道參加「遠運」的女排表演賽；1926年，該二隊復受邀於華東運動會中示範表演；為了參加表演賽，這兩所女校經常舉行友誼比賽，互相切磋。¹⁵

這種情形至1927年之後明顯改變，一則是這一年列有女子排球表演賽的「遠運」於上海舉行，再則1928年江蘇大學區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首開女籃與女排比賽。¹⁶更重要的是，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十分重視體育，不僅加強學校的體育措施，也竭力推展全民體育，並擴大舉辦「全運」。¹⁷為配合政府政策，學校的體育活動明顯的比以前頻繁，體育課之外，有的學校又安排早操和課外活動。儘管1937年1月國民政府始對課外活動訂定強硬實施的規定，但事實上，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已有學校受「體育救國」

¹² 一支是由不同年級學生組成的「雲雀隊」，另一是四年級學生發起的「畫眉隊」，再一支是由新成立的「白頭翁隊」。不過，因前兩隊球員相繼畢業離校，最後僅存「白頭翁隊」。以上分別參見 How Mo Li '21, 'Athletics', 《墨梯》期2 (1918年6月), 頁29 和 Zee Yeu Yong, 'Athletics', 《墨梯》期3 (1919年6月), 頁14。

¹³ 蘇州市檔案館藏, 檔號 Q235-3-110, 〈雜俎: 運動必要〉, 《啓明女學校校友會雜誌》期1 (1920年), 頁114。

¹⁴ 張世鑾, 〈特別記事: 參觀江蘇省立各學校第二次聯合運動會〉, 《教育雜誌》卷7期12 (1915年12月), 頁92; 心宏, 〈江蘇省立各校第三屆聯合運動會〉, 《教育雜誌》卷8期12 (1916年12月), 頁65。

¹⁵ 〈女子隊球表演〉, 《申報》, 1926年6月11日, 頁11。

¹⁶ 參賽者雖僅4所學校, 但為破天荒盛舉。〈女子球類比賽〉, 《申報》, 1928年4月30日, 頁11; 袁宗澤, 〈江蘇省運動會史略〉, 《體育研究與通訊》卷1期2 (1933年3月), 頁81。

¹⁷ 游鑑明, 〈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 《新史學》, 頁128。

觀念的影響，自行強迫學生進行課餘運動。¹⁸浙江處州中學曾規定每週一、二、五下午課後爲學生運動時間，全體學生務必投身操場，不准逗留於教室中。¹⁹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則強迫男女學生每學期至少需選習一至二種的課外運動項目：選定之後，一學期內不得隨意更改，由體育部編隊分組，排定練習日程，並分配場地練習。²⁰

課外活動的項目是根據學校現有的設備和人力而編排，各校所列的項目因此不一，但籃、排球運動是每個學校必有的活動項目，致使有興趣打球的女學生人數逐漸增多。此外，學生自治會的成立也利於體育的推動，由於多數自治會設有體育股或體育會，不僅與學校的體育部互通有無，且因該組織產生自學生間，能依據同學的興趣舉辦體育活動，對校內的體育發展貢獻不小。²¹聖瑪利亞女校的課外活動便是由體育會和學校共同合辦；蘇州振華女校的體育股則設有各種運動錦標比賽，其中球類競賽以級爲單位，分網球、排球和籃球三種；同時體育股也舉辦校際間的球類友誼賽。²²

且不論是否每個學校都能照章行事或主動倡導體育，母可否認的，這種自上而下大力推動體育的政策，確實爲一些學校助長運動風氣。尤其重要的是，1929年以來華東地區經常有體育組織定期發起女子球賽，各種運動會也將女子球類運動列爲競賽項目，不再以表演方式演出，使沈寂的女子體

¹⁸ 教育部恐各校於課後擅加鐘點授課，妨礙學生體育活動，並影響青年身心健康，決定自1936年下學年度起，午後三點一律爲課外運動時間，絕對不准授課；同時規定每個學生每天至少有2小時以上的課外運動。〈教育部規定各中學體育活動時間〉，上海《時報》，1937年1月7日，版7。

¹⁹ 葉楚，〈記處州中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麗水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麗水文史資料》（麗水：1990年），頁29。

²⁰ 〈浙江省立第四中學〉，《體育半月刊》期34-35（1933年5月），頁116。

²¹ 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學於1935年成立學生自治會，該會的體育股曾舉辦運動會，並設置各類球隊，增加學生對體育的興趣。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85，〈自治會之歷史〉，《丁丑年刊》（1937年），頁289。

²² 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140，沈愛麗，〈課外運動〉，《鳳藻》（1937年）；蘇州市檔案館藏，甲5-1-419，康蓮娟，〈球類比賽報告〉，《蘇州振華女學校校刊》（1933年4月），頁50。

育轉趨活躍，向來不重視體育的學校，開始競相注重女子體育。²³組織球隊一時成爲校園的時尚活動。

其中 1929 年「上海中華女子籃球會」（又稱「上海女子籃球聯合會」，以下簡稱「上海女籃會」）的成立，曾將此一盛況帶入高潮。該會是由上海女子籃球界的霸主崇德女校所發起、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以下簡稱「體協會」）主辦，有鑑於體育事業偏重男性以及上海女界對體育活動缺乏熱忱，上海崇德女校提出組織女子籃球會的構想，並邀請上海數十所中學女校與設有女子部的大學共襄盛舉，期藉此「收觀摩切磋之益，互求進步於他日」。²⁴由於這是上海女子體育界的空前創舉，引起廣泛的關注，不少學校或女學生視加入「上海女籃會」爲一大光榮，紛紛厲兵秣馬，展開整頓或成立籃球隊的工作。²⁵此後因球會組織的次第成立，加以有規模球賽的不斷發起，校園球隊的組成在三〇年代上半葉相當普遍，同時擁有多支球隊的學校也日益增加，特別是女學生較多、球技出名以及以體育教學爲主的學校。1934 年，啓秀女中便瀰漫著組球隊的熱潮，幾乎每級都成立球隊，一時蓬蓬球聲傳遍全校。²⁶儘管各校球隊日增，一般學校的校隊代表只有一隊，啓秀的校隊即是來自各級隊的精銳。²⁷但參戰頻率較高的學校則有一支以上的球隊，如大夏大學有兩隊，兩江女子體育多達 4 隊。²⁸

此一時期，校隊的成立不是來自學校的倡導便是學生的自願。凡受到學校眷顧的校隊較能得天獨厚，以東南女子體專爲例，該校一向雖力倡籃球，卻不曾正式組織球隊外出比賽，迨加入「上海女籃會」之後，該校遂挑

²³ 〈蘇州女運動會〉，《申報》，1930 年 5 月 10 日，頁 17。

²⁴ 此一信函大致如下：「年來我國體育事業，蒸蒸日上，殊可欣幸，然所提倡者，皆偏重男子，我女界姐妹，仍少動靜，且尤以上海爲最，敝校不揣冒昧，有上海中華女子籃球會之發起。」。〈上海空前之中華女子籃球會〉，《申報》，1929 年 3 月 19 日，頁 11。

²⁵ 詳見這段期間申報的「學校生活」專欄。

²⁶ 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108，劉珍寶、嚴蔚雯，〈我校籃球隊小史〉，《啓秀年刊》（1939 年），無頁碼。

²⁷ 劉珍寶、嚴蔚雯，〈我校籃球隊小史〉，《啓秀年刊》，無頁碼。

²⁸ 大夏的籃球隊有二支：一爲大學部及師專的混合隊；另一爲幼稚師範隊。參見《大夏週報》卷 7 期 15（1931 年 3 月 25 日），頁 342。

選健將組織強東籃球隊（以下簡稱「強東隊」），同時聘請交通大學的體育主任擔任指導。²⁹另如大夏大學不但在女生體育會中成立各種球類校隊和田徑校隊，同時特為女學生開闢球場，增加她們練球的機會。³⁰這些有利因素，確實助長球隊的表現，東南女體專的「強東隊」經由一個月的正式訓練，球藝大為精進，不但所向無敵，甚至打敗崇德奪得錦標，成為上海籃球界的霸主。³¹大夏也在「江南大學體育協會」（以下簡稱「江大」）舉辦的球賽中時有捷報。

反之，無法獲得學校支援的球隊則面臨不少問題。上海大同大學自成立體育委員會後，由學生自組球隊，結果因球隊達 50 多隊，學校的體育指導無法兼顧，新成立的女子排球隊惟有請 4 名擅長排球的男同學指點。³²三〇年代名聞全國的兩江女子體專的籃球隊（以下簡稱「兩江隊」）於 1925 年成立，卻至 1929 年始聘專家指導，署名「女俠」的論者曾針對此事指出，該校有不少體育人才，但因未成立校隊，又乏人指導，因此埋沒不少「巾幗英雄」。³³事實上，球隊聘不到專家指導固然與學校的態度有關，體育教師的缺乏是另一項不可忽視的因素，導致多數球員的球技是來自相互切磋或男球員的指導。此外，體育設備的不足也帶給球員困擾，1929 年，上海中學女子部為參加上海市第一體育場舉辦的排球賽，積極成軍，並向學校要求津貼球衣，詎料學校以經費拮据回絕，球隊為此喪失一場比賽權；直至校方同

²⁹ 〈強東籃球隊的健將畢業了〉，《申報》，1929 年 7 月 2 日，增刊，頁 8；這種聘專業指導的例子，尚可見於啓秀女中和勞動中學、南京中學的女子部，參見〈勞中女子籃球隊成立〉，《申報》，1929 年 10 月 20 日，增刊，頁 9；〈啓秀的籃球隊〉，《申報》，1929 年 11 月 17 日，增刊，頁 7；〈女子籃球賽：南中昨日戰勝遺族〉，《中央日報》，1931 年 4 月 10 日，張 3，版 2。

³⁰ 〈大夏週報〉期 68（1929 年 12 月 4 日），頁 15、22。

³¹ 〈強東籃球的健將畢業了〉，《申報》，增刊，頁 8。

³² 〈大同大學之女子排球隊〉，《申報》，1929 年 6 月 10 日，增刊，頁 7。

³³ 吳志明、呂權、吳健，〈陸禮華與中國女子體育運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42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175；女俠，〈預選〉，《申報》，1929 年 9 月 18 日，增刊，頁 3。

意補助，該隊方以正式成立的名義，加入這場球賽。³⁴

至於球場的不敷使用，更是問題重重，經常造成學生間的衝突。1929年上海勞動中學的校園便曾爆發男女同學爭奪球場的激動場面。據報導，自該校球隊與日俱增以來，學校的運動場所和運動設備並未相對增加，為爭取練球的機會，球隊間爭端時起，這場衝突即肇因於此。當日原是女子球隊的練球時間，不料有兩支男子隊擬作比賽，竟請求女同學退場，以便他們獻技，但這支球隊已因男子隊賽球犧牲多次擲籃機會，因此拒不退讓。為圖報復，一名男同學故意將女同學失手的球踢入水田中，而女同學也不甘示弱，奪走男同學的球，同樣丟入水田中。在雙方情緒都失控下，有一名男同學下水撿起他們的球，卻將女同學的球丟得更遠，女同學見此情形備感受辱，於是：

也有一個密斯發義憤，連鞋襪也沒有脫，踏下水田去，拾取這球，而且把男同學的一個也劫來，送交訓育課。³⁵

其後雙方雖各派代表談判，卻互不相讓，爭辯達兩個小時，直到訓育主任再三規勸，這場爭執始告平息。³⁶

由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勞中學生的不睦是基於球場不足，但此中又有兩性問題的存在。從男球員霸占球場再至羞辱女球員的舉動顯示，當女性進入原由男性操控的場域時，兩性間的緊張關係從而形成；不過，女性一旦有機會進入這個場域或這個場域中的公平性被破壞時，她們並不完全退讓，會設法進入核心或訴求正義。由於球場問題嚴重影響球員練球機會，有的學校訂有練球時間以防範衝突，例如交大的籃球部便為籃球隊安排練習時間，方便男女學生分開練球。³⁷浙江鄞縣私立效實中學甚至頒布「球隊練習登記簡章」，簡章上註明：「每隊練習日期登記一星期暫以三次為限」、「練習日期場地如數隊相同則以登記先後為去取」以及「如登記後繼續在一星期並不

³⁴ 〈上中女生排球隊〉，《申報》，1929年11月13日，增刊，頁9-10。

³⁵ 〈勞中男女籃球隊的小風波〉，《申報》，1929年6月30日，增刊，頁5。

³⁶ 〈勞中男女籃球隊的小風波〉，《申報》，增刊，頁5。

³⁷ 〈交大女生最近的運動〉，《申報》，1930年4月12日，增刊，頁4。

練習則作解散論」。³⁸

除了外在條件之外，內在條件也影響球隊的成長。學校球隊的成立是緣於球類人才的參與，早期因這方面人才有限，加以多數球賽未對球員資格訂定規則，球隊的成員十分複雜，有的以在校生為主，有的則向外調兵遣將，致有本校校友和他校校友混合而成的球隊，1929年，「上海女籃會」的會員有7隊，其中崇德是集崇德校友及南洋大學、暨南大學等離校健將而成。³⁹其後賽規日嚴，球員多數來自本校，即使有校友加入，也必須以業餘身份參賽。

一般而言，大學的女子球員主要來自訓練有素的中學球員，較易糾集精銳成軍。1928年交大成立排球隊，隊中的陶蕪、吳澍、張純蓀和吳鳳珠均曾是中學時期代表華東出席遠運的排球校隊高手。⁴⁰由於這批人才的加入，使球隊深具朝氣，而她們也受到高度期許。另如持志大學的女排自有排球女將朱友蘭入隊之後，該校同學冀予厚望，期望朱能領導隊友在女排球隊爭一席之地。⁴¹但是靈魂球員通常無法常駐於球隊中，隨著學業結束或其他事由，校隊球員經常更迭，在人才青黃不接下，校隊惟有暫停活動或宣告解散。1929年交大的女排即因陶蕪生病離校、吳鳳珠因事退學而停頓半年，直至陶復學以及擅長排球的新生加入，球隊始重新組成。⁴²

另外，此期愛好球運的學生固然不少，精通某類球技的人才卻有限，因此組織球隊時，常有一人二用的考慮。1929年兩江在預選女子籃、排球隊員時，有感於排球人才鮮少，決定從喜愛運動的學生中挑選，結果有15名學生被認為可能獲選。而這15人中，5名是籃球隊員、另6名則是籃球隊極力吸收的人選。⁴³再自浙江省立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浙中」）也看到

³⁸ 〈鄞縣私立效實中學〉，《體育半月刊》期32-33（1933年5月），頁68-69。

³⁹ 〈今日開幕之女子籃球賽〉，《申報》，1929年12月14日，頁11。

⁴⁰ 〈交大女生排球隊又將復興〉，《申報》，1929年10月8日，增刊，頁2。

⁴¹ 紅蓼，〈持志大學的排球女將〉，《申報》，1930年3月28日，增刊，頁2。

⁴² 〈交大女生排球隊又將復興〉，《申報》，增刊，頁2。

⁴³ 這5位分別是涂雲生、邵錦英、鍾益賢、尤靜與楊品剛；另則是莊前霞、莊淑玉、吳志宏、張華珍、龍競雄、胡令德和溫貫明。女俠，〈預選〉，《申報》，增刊，頁3。

類此現象，該校女子排球隊的隊員計有 13 人，但其中包括隊長等 8 人均是籃球隊員。⁴⁴這種一人身兼數隊的情形，令球員疲於奔命，且影響球隊素質。浙中女排隊隊長王華貞曾因女排戰果欠佳而喟歎：

成績談不到，練習時又不能全體出席。同時我們女同學又少，這樣要求，那樣要求，一個人兼著數差，實在使我們感著精力方面難以應付了！⁴⁵

但也有學校禁止球員跨隊，崇德於 1933 年首次成立排球隊時，即規定籃球隊員不准加入，俾使該項運動普及全校。⁴⁶

不過，儘管球隊積極佈署並排除萬難，卻無法防範一些不可預測事件的發生。例如 1932 年爆發一二八戰役之後，由於不少學校被迫停課，加以體育活動的暫停，一時活躍於校園中的球員都消聲匿跡，球隊也隨之解散。啓秀女中即曾停課半年，迨至復課，球員卻已星散大半，有意打球的同學惟有另起爐灶，重新組軍。⁴⁷

無論校隊或球員本身面臨多大困境，一旦選為校隊球員，無不認真練球，從來自三所學校校園的報導可以看到：

自女子籃球隊加入籃球會以後，練習不懈，每日無間，每日黎明即有無數女英雄，馳騁於球場，冀異日奪標之預備。⁴⁸

……每當晨曦初放，男同學正尚在黑甜鄉大做好夢的時候，那班女英雄已在健身房裡大施其好身手。⁴⁹

當午後六時至七時，夕陽已落，月色初明之後（案：原作「候」），

⁴⁴ 這 8 人分別是隊長鄭涵書、幹事錢愛琴以及隊員周燮香、王華貞、袁慰庭、黃亦新、萬紹文和陳福和。〈浙江省立高級中學〉，《體育半月刊》期 36-37，（1933 年 5 月），頁 62-64。

⁴⁵ 〈浙江省立高級中學〉，《體育半月刊》，頁 64。

⁴⁶ 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102，〈學生團體消息〉，《德音半月刊》卷 1 期 2（1932 年 9 月 30 日），頁 13。

⁴⁷ 劉珍寶、嚴蔚雯，〈我校籃球隊小史〉，《啓秀年刊》，無頁碼。

⁴⁸ 〈暨南女生愛籃球〉，《申報》，1929 年 4 月 19 日，增刊，頁 7。

⁴⁹ 〈中公女子籃球隊〉，《申報》，1929 年 6 月 10 日，增刊，頁 7。

輒見健身房中，女英雄角逐盛況。⁵⁰

由是顯示，女球員對練球的執著，而這種態度甚至不讓鬚眉。

爲了增加球藝，球員經常與校內同學展開球賽，在男女同學的校園中，甚至可以看到兩性一道練球的情景，浙中女籃球隊曾指出，她們球藝之能猛進便是受益於有機會和男同學練球。⁵¹另外，球員常抱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邀請其他學校做友誼賽，1929年中國公學的女子籃球隊（以下簡稱「中公女籃」）於成軍不久，即向上海各女校下戰書，充分表現該校的雄心。⁵²至於提出友誼賽的球隊，不是僅向實力相當的球隊挑戰，也對冠軍球隊邀戰，上海江南體育學校女籃球隊曾致函崇德女校，表明道：

素仰貴隊技術優良，聲譽卓著。敝隊同人不能勝欣羨之至。茲爲尋求技術上之進步起見，渴望貴隊指教，俯允與敝隊作友誼比賽一次。⁵³無疑的，技術懸殊的球隊會師時，勝敗立見。例如中公女籃面對強手復旦時，曾出現「茫無頭緒，常常把球傳給敵方」的窘態。⁵⁴惟這種挫敗對甫成軍的球隊而言，是一種經驗的累積，無礙球隊的發展。

由於校隊代表學校，有的學校訂有對外比賽規程，以規範球員。例如浙江嘉興女中不僅要求校隊名稱、隊旗、隊長、校隊訓練和組隊參賽需根據校方規定或獲校方許可，同時球員的學業成績及品德也需合乎校方標準，凡「學業成績三分之一不及格者及操行劣等者」與「不尊重運動規則及運動道德者」均不得爲該校代表。⁵⁵儘管目前尚未有其他學校的資料，但從嘉興女中的規定可以看出，在成爲公眾人物之前，該校期待的球員必須是球藝與學養兼備者。

此期的球員一方面產生自校園，另一方面則出於體育單位的培訓，儘

⁵⁰ 〈交大女生最近的運動〉，《申報》，增刊，頁4。

⁵¹ 〈浙江省立高級中學〉，《體育半月刊》，頁63。

⁵² 〈中公女子籃球兩大戰〉，《申報》，1929年6月16日，增刊，頁7。

⁵³ 〈學生團體消息〉，《德音半月刊》卷1期1（1932年9月15日），頁4。

⁵⁴ 〈中公女子籃球兩大戰〉，《申報》，頁7。

⁵⁵ 〈嘉興縣立女子中學〉，《體育半月刊》期32-33（1933年5月），頁140。

管後一類球員的人數極少，卻是代表地方或國家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球賽的精英，因此有一定的遴選和培訓過程。以出席「遠運」的中華隊代表為例，球員必須先接受地區選拔，再以區域代表的身份參加全國預選；凡由地區選拔出的球員主要來自各校校隊的精銳，在女子球隊尚未蔚為風氣之前，因僅有少數球隊參加遴選，競爭性並不大。例如 1927 年因華東地區有能力組織排球女隊的學校僅有裨文、民立和中西三所女校，這一年「遠運」華東區的 16 名球員代表即選自裨文和民立；其中 6 名在全國預選時入選為中華隊代表。⁵⁶

理論上預選的方式應隨著競爭球隊日增而愈趨嚴格。實際上卻不然，1930 年首次舉辦的萬國女籃賽因參賽者來自世界各地，中華代表隊的人選備受重視，但代表人選並未產生自預選，籌備委員會係從兩江、強南和六星⁵⁷等勁旅中挑選精英成軍。⁵⁸1934 年「遠運」的女排代表也未舉行預選，僅對具精良技術的球員進行篩選，在 15 名代表中，上海的球員占了 8 名。⁵⁹

這些球員不是代表地方便是國家，因此主辦單位給予嚴格的訓練，並聘有專家指導。從 1935 年上海女籃隊員的「全運」會前訓練辦法略窺一斑，受訓球員有 16 人，分前後兩期，前期的訓練期限是一個半月，每週 3 次，三週後開始作友誼賽，以期增加球員間互助合作的精神，訓練完畢正式選出 10 人代表上海市參賽，並進行後期訓練，直至大會開幕始結束訓練。⁶⁰後期訓練每週訓練 4 次，若經濟寬裕擬採合宿辦法，讓球員在規律的生活下受科學化的嚴格訓練，裨便球員的技能體力或精神均可達佳境。此外，又訂有訓練規約，要求球員切實遵守，包括服從指導員的命令、按時到場練球、不得

⁵⁶ 在 21 名選手中，華東區計有王大樂、朱民寶、蘇祖琦、蕭家珍、陳彩鳳等 6 人。〈中國女子排球選手名單〉，《申報》，1927 年 8 月 24 日，頁 7。

⁵⁷ 六星隊是由崇德、培成、暨南等校隊組成的。〈六星女籃球隊成立〉，《申報》，1930 年 2 月 2 日，頁 10。

⁵⁸ 共計有郭筱萍、吳佩華、錢奇珍、楊若青、陳英瑞、余啓英、蔣懷宣、吳雪英、秦浩然、邵錦英、朱民寶、康均、莊時玉、王蘭、陳新元、葉福基等 16 名球員。〈籌備中之上海萬國男、女籃球賽〉，《申報》，1930 年 3 月 12 日，頁 12。

⁵⁹ 〈我國女排球代表已選定十五〉，北平《晨報》，1934 年 4 月 22 日，版 9。

⁶⁰ 〈本市參加全運會〉，上海《時報》，1935 年 7 月 24 日，版 7。

無故缺席以及注意個人健康、日常生活與學習精神等。⁶¹

總之，校園球隊的組成有來自學校支持也有學生自願，得助於學校的球隊較能順利成軍，而由學生自組的球隊在技術指導或經費上易陷入窘境，並有場地不敷使用的困擾，球員間甚至為此而衝突。不過這些問題尚能克服，有的情況則非球隊所能控制，例如球類人才的難求、球隊壽命的有限以及突如其來的戰爭等。惟儘管如此，女球員熱衷組隊參賽的熱情並未稍減，經常無分晝夜的練球，這種精神顯現女球員對球類運動的執著，也呈現他們對球賽戰果的重視。除校園球員之外，另有由體育單位培訓的球員，這些球員主要代表地區和國家出賽，故選自各精銳校隊，再加以嚴格訓練，培養她們的過程明顯的與校隊不同。

三、女球員馳騁球場

正式球賽展開之初並未有組織性的比賽，迨至有女子運動團體，球類競賽始進入規畫。這類團體主要產生在大城市，1929年3月在東吳大學體育教員許輝業發起下，蘇州成立了「蘇州女子體育會」；同年，上海也成立前述的「上海女籃會」。⁶²各女子體育會成立後，遂積極展開體育活動，「蘇州女子體育會」於組成當日即舉行女子籃球會，安排當地四所女中進行比賽；其後又舉辦女子排球賽。「上海女籃會」於募得6隊會員之後，也編排賽程，展開15場比賽，其中「上海女籃會」的活動尤受重視，該會因首開上海女籃比賽的先河，最初幾屆的比賽，不僅參賽球隊踴躍，競爭更為激烈，籃壇霸主因此不斷易主，由崇德隊轉為東南女體專的強東隊、強南隊，再是

⁶¹ 其規約如下：（一）各隊員須絕對服從指導員之命令及其採用之方法；（二）隊員於規定練習及特約比賽之有臨時通知者，均須按時到場練習；（三）各隊員之有特殊情形因故缺席，應於事前繕具正式請假書，向指導員請假不得無故缺席；（四）隊員中有無故缺席一次或一次以上者，指導員得審核其理由予以相當懲戒；（五）各隊員在受訓期間對於各人之健康以及日常生活均須深切注意；（六）隊員中之無上進精神者，初犯時指導員得予以警告；如屢戒不改，得逕行取消其資格，另選他人替補之。（本市參加全運會），上海《時報》，版7。

⁶² 〈蘇州女體育會籃球賽開幕〉，《申報》，1929年3月20日，頁11。

兩江隊，此後兩江一直擁有后座。⁶³

由女子運動團體舉辦的球賽不完全限於國人，比賽對象也包括租界地的西僑，上海即常有國人與西僑的籃球賽。早期與西僑比球的主要是教會女校，1927-1928年間，金陵女子大學、復旦和崇德曾以友誼賽的名義，各自邀請西僑青年會的女子籃球隊（以下簡稱「西青女隊」）賽球。⁶⁴由於西僑實力雄厚，這種比賽除有助於球藝的增長之外，並具有提倡女子籃球的用意。⁶⁵

1928年以降，因上海西僑青年會體育館的落成以及「西青籃球會」、「西青女子籃球會」（以下簡稱「西青女籃會」）、「西青排球會」的陸續成立，西僑開始定期舉辦籃、排球邀請賽。⁶⁶其中女籃賽因由「西青女籃會」單獨發起，規模或活動遠較女排賽受到注意。「西青女籃會」成立後也訂有會規，並固定比賽時間，定期比賽方式使國人與西僑賽球的機會大為增加。⁶⁷該會發起之初，崇德女校是唯一的華人球隊，儘管該隊出戰期間均未獲勝，但因與「西青隊」旗鼓相當，雙方交手不時出現精采局面，仍贏得觀眾的讚美。⁶⁸1929年12月，強南隊也加入「西青女籃會」，該隊入會不久即以20比15的戰績挫敗「西青女隊」，由於這是該會成立以來，華人球隊首次得勝，各大報紙紛紛報導這項喜訊，例如《申報》出現「中國女子尙武可

⁶³ 15場比賽自4月13日至5月5日，而入會會員計有東南體專的強東、強南隊以及崇德女校、暨南大學，南洋英專和大夏大學等4校校隊。〈蘇州女體育會籃球賽開幕〉，《申報》，頁11；〈女子籃球會定期舉行〉，《申報》，1929年4月10日，頁11。

⁶⁴ 1927年元旦，金陵女大曾邀請西僑青年會的女子籃球隊至南京做友誼賽。以上參見〈金陵女大籃球隊勝上海西女士〉，《申報》，1927年1月4日，頁8。另見〈今日之籃球比賽〉，《申報》，1927年12月16日，頁8；〈今晚有女籃球賽〉，《申報》，1928年1月17日，頁10。

⁶⁵ 1928年1月，崇德女校約西青女籃賽球，乃是有鑑於籃球比賽多為男性，擬藉機為女界開倡風氣。〈今晚有女籃球賽〉，《申報》，頁10。

⁶⁶ 這些籃球會分由青年會體育部發起，「西青籃球會」成立於1928年，翌年始有「西青女子籃球會」。上海體育志編輯委員會，《上海體育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6），頁184。

⁶⁷ 有關規定參見〈西青女子籃球會：強南崇德加入〉，《申報》，1929年12月10日，頁9。

⁶⁸ 〈西青女籃球隊劇戰崇德〉，《申報》，1929年3月12日，頁11。

慶」的標題。⁶⁹顯而可見的是，與西人賽球不僅在表現球技，同時也展露中華女性在體能方面不落西人。

1931年之後，入會的中華球隊略增，而且表現優異，特別是譽滿上海的兩江隊曾在「西青女籃會」中蟬聯三屆錦標，令西僑刮目相看，贏得「常勝軍」的美名。⁷⁰不過，至1935年時，因「西青女籃會」試用男子比賽規則，導致不少球隊裹足不前，中華學生代表隊僅兩江甲、乙二組報名。⁷¹對兩江言，該隊固曾採男子規則與外界比賽，但因國內正式的女籃賽向來採女子規則，因此在不諳男規的情況下，兩江的表現大為失色，致而喪失錦標。⁷²1936年，「西青女籃會」雖宣布歡迎中華女子隊參加，卻因報名者寥寥，再採女子規則，惟仍無法吸引較多球隊參與。⁷³

從上海中華籃球隊與西僑的球賽可以看出，由於西僑球藝精湛，加以人高馬大，有能力與她們應戰的中華球隊相當有限，迎戰者主要是當地實力雄厚的球隊，崇德、東南和兩江等校的球隊便是一時之選，其中兩江曾身經百戰，頗具職業球隊的水準。透過這類比賽，中華球隊不僅有機會炫技，同時也獲得磨練球技的機會，有助於她們參與大型的球類競賽，例如強南於打敗西青後，曾乘勝追擊，以6戰6勝的佳績於稍後舉辦的「上海女籃會」中贏得冠軍。⁷⁴

除有女子運動團體主辦的女子籃球賽之外，為提倡女子體育，一般社團或體育團體也於此期召開女子籃、排球賽，並訂有比賽規程，使球隊能依規定參賽。其中在上海展開的女子籃、排賽尤其多樣，有世界性、地方性及校際間等類比賽。例如由「體協會」發起的上海萬國女子籃球賽、上海青年

⁶⁹ 〈中西女子籃球賽：強南戰勝西青〉，《申報》，1929年12月8日，頁11。

⁷⁰ 〈常勝軍初逢敵手〉，《申報》，1931年2月8日，頁11；另可詳見1931-1934年間，各報紙有關「西青女籃賽」的報導。

⁷¹ 這年有社會隊參賽，中華代表隊是黑鷹隊。〈西青女子籃球：兩江勝利雙收〉，《申報》，1935年1月22日，頁16。

⁷² 〈西青女籃球：兩江甲昨受挫〉，《申報》，1935年1月31日，頁18。

⁷³ 〈西青女籃球賽：報名加入者仍寥寥〉，《申報》，1936年2月26日，頁13。

⁷⁴ 〈中華女子籃球賽：強南獲錦標〉，《申報》，1929年12月29日，頁17。

會設置的女子組籃、排球賽以及上海市體育協進會主辦的「鐵城盃籃球賽」女子組等。此外，以中學和大學女學生爲主的女子籃、排賽也應運而生，與其他比賽不同的是，多數球賽無學制限定，舉凡中學、大學或體育專門學校均可報名參加，並混合對打，獲勝或參賽者最終多流爲訓練有素的體專校隊，如兩江、強南等隊；但這項比賽純以中等女校爲主，使中學女生得以和實力較接近的隊友競爭。大體上言，女排的冠軍多爲啓秀所得，女籃錦標則歸崇德。至於大學女子籃、排賽，較著名的是「江大」舉辦的女子組球賽，每次參賽的大學女生隊主要來自金陵、暨南、中央、大夏、光華和復旦等校。

75

各類型運動會中也都設有籃、排球賽，大型運動會如「遠運」和「全運」，小型運動會則由江蘇、浙江兩省以及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等市所舉辦。參與大型運動會的球員選自各球隊的精銳，能雀屏中選的球員主要來自明星球隊，如暨南、兩江、東南、民立、務本、崇德和金陵等校的球隊。由於這些球員的傑出表現，使她們從地方明星球員升爲名噪全國的女球員，甚至享譽國外，從〈附錄一〉即可看到當時的部分明星球員，如排球健將關柳珠、劉瑪琍、張璧如、黃杏芬、蕭俊英、陶純、朱民寶；籃球精英潘月英、陳白雪、陳榮明、楊森、陳聚才、陳婉卿、陳金釵、許沅。

正式球賽之外，友誼賽也在會外展開，有的友誼賽是應觀衆盛情而舉辦，1931年東光隊因隊員不足，致使由「西青女籃賽」安排的一場「兩江對東光」的正式比賽無法上場，但因觀衆甚多，東光遂向兩江借兵，改作友誼賽，以饗觀衆。⁷⁶有的友誼賽則純爲練習球技而召開，由於這些球員多爲球場老將，極重視各自的表現。1933年，兩江準備至歐美等地遠征，爲求經驗和技術的精進，曾與西僑各勁隊舉行多次友誼練習賽，其間雖有小挫，該隊毫不退讓，繼續各場比賽；而西僑也集合明星球員迎戰，致使每場球賽均有不凡的演出，仿如正式球賽。⁷⁷賽前的友誼賽在大型運動會召開前尤其

⁷⁵ 詳見此期各報紙中有關江大籃球賽的報導。

⁷⁶ 〈西青女籃昨賽結果〉，《申報》，1931年2月15日，頁13。

⁷⁷ 〈最後二分鐘：兩江慘敗〉，《申報》，1933年2月21日，頁12；〈今晚男女籃球賽〉，

常見，同時頗受關注。⁷⁸

明星球隊也常受邀出席其他機關、學校舉辦的友誼賽，如慶賀校慶、賑濟災荒等，1929年為籌募陝甘豫賑款，「上海女籃」的冠軍強東隊和亞軍崇德隊曾受邀進行女子籃球慈善賽，券資所得悉數賑濟災荒。⁷⁹不過，這類比賽多係表演性質，較無競賽意涵。

由於友誼賽不是正規的比賽，競賽對象不受限制，球隊不僅和同性較勁，也與異性球隊量力。這種場面是正式球賽所不曾見，因此相當引人注目，有趣的是，交戰雙方互不相讓，全無性別差異。《上海時報》曾對一幕男女排賽做了如下報導：

對壘者為晨鐘及東燕，前者屬娥眉倒豎之娘子軍，後者係威風凜凜的少爺兵，交綏之下，娘子軍非同凡響，以三比一擊退偉男子東燕隊，為婦女體育界生色不少。⁸⁰

儘管這場比賽是在酷暑下進行，雙方球隊仍認真出戰。⁸¹

事實上，勇於接受異性邀戰的女球隊多半實力雄厚，而邀戰的男生球隊則是抱著好奇的心態。1929年5月為吸引觀眾，並使球賽具新鮮感，在上海男子排球界素負盛名的大夏大學男子隊曾邀戰勇敢善戰的民立女中排球隊。由於該隊未於挑戰書中說明與賽者是女生還是男生，導致民立隊的不

《申報》，1933年2月24日，頁2；〈兩江女籃球隊〉，《申報》，1933年2月24日，頁11；〈兩江女籃球隊戰划船綠隊〉，《申報》，1933年2月27日，頁11。

⁷⁸ 1920年，參加「遠運」的女排選手隊曾邀請上海女排名隊民立隊比賽；1935年，參加「全運」的上海市女子籃球代表隊，雖然是由兩江、東亞和東南等精銳組成，且曾經過集訓，實力銳不可擋，仍邀請上海市的業餘女籃球隊綠蒂、黑鷹等做友誼賽。以上參見〈男女排球比賽〉，《申報》，1930年5月13日，頁10；〈上海市女子籃球小試手腳大勝綠蒂〉，上海《時報》，1935年9月9日，版7；〈上海市女籃球：陳家將初展身手〉，上海《時報》，1935年9月21日，版7。

⁷⁹ 〈崇德女學籃球隊最後表演〉，《申報》，1929年6月29日，增刊，頁7-8；這類活動尚可見於〈交大校慶排球賽〉，《申報》，1936年4月11日，頁13；〈今晚七時男女六校〉，《申報》，1934年12月19日，頁13；〈大同大學定期舉行賑災男女籃球賽〉，《申報》，1934年12月16日，頁18。

⁸⁰ 〈一幕男女排球賽：晨鐘勝東燕〉，上海《時報》，1934年6月26日，版8。

⁸¹ 〈一幕男女排球賽：晨鐘勝東燕〉，上海《時報》，版8。

悅，堅稱女隊應戰方肯出馬，但因女生召集不易，只好臨時組成男女混合隊出戰。比賽三局後，民立隊又與男隊交戰二局，這五局比賽歷時三小時之久，雖然民立隊的戰果不佳，卻毫無倦態，深受觀眾欽佩，該校記者視這項比賽為女界罕有、空前未見的劇戰。⁸²

此期有男女對打的球賽主要是排球賽，但籃球賽也曾有男女隊交戰的局面，出戰的球隊大多是首屈一指的球隊，例如兩江隊即有和男隊比賽的多次經驗。兩江之所以迎戰男隊，一則是為增進球技，另則是試用男籃規則，1930年該隊與童子籃球隊、交大籃球隊和上海體育新聞記者團的比賽便是採男籃規則，而這幾場比賽互有勝負。⁸³異性間的籃球賽不完全是嚴肅的演出，有時以輕鬆方式進行，1933年杭州「浙江建設運動會」閉幕後，上海各報特派記者應廳長之約，與廳長組成一球隊，對抗東南、兩江隊，由於這場比賽純係餘興表演，因此比賽時笑料百出，與一般球賽大異其趣。⁸⁴

無論正式或非正式的球賽均使女球員展現球藝的機會大為增加，她們走出校園，到校外的體育館和運動場表演。有的球隊甚至遠征其他省市，乃至國外，兩江籃球隊便因盛名遠播，經常出訪。1930年10月，該隊首度展開至外省的系列友誼賽，這也是全國第一支與外省市球隊聯誼的女子籃球隊。行前該校特別宴請新聞界，表明該隊擬於不久赴日本比賽，但在赴日之前，期望與平津地區的球隊切磋球藝，並提倡體育。⁸⁵由於兩江隊是乘船前往，沿途風浪頗大，致使球員飽受暈船之苦。⁸⁶抵津不久，該隊即展開連續

⁸² 〈民立女中與大夏混合隊之排球戰〉，《申報》，1929年6月5日，增刊，頁5。

⁸³ 〈兩江女子籃球與男子戰〉，《申報》，1930年5月17日，頁12；〈男女籃球戰童子勝兩江〉，《申報》，1930年6月17日，頁11；〈籃球戰一分之差：女子勝男子〉，《申報》，1930年6月18日，頁11；〈今日下午七時：男女籃球戰〉，《申報》，1930年8月14日，頁10。

⁸⁴ 〈杭州浙江建設運動會開幕〉，《申報》，1933年1月7日，頁18。

⁸⁵ 另一說是兩江有鑑於上海女籃氣象消沈，擬赴日本賽球，但因日方要求緩行，該隊乃轉赴平津。〈兩江女體校籃球隊北征〉，《申報》，1930年10月18日，頁12；〈兩江北征籃球隊獲勝紀〉，《申報》，1930年12月5日，頁9。

⁸⁶ 船至黑水洋中，風浪大作，船身搖動不已，8位隊員無不作嘔，無法進食；次日夜晚亦復如是，隊員痛哭流涕，欲歸不得，迨抵天津已疲憊不堪。〈兩江女籃隊昨午始抵津〉，

三天的密集式友誼賽，在四場球賽中兩江均告捷；而觀眾更不顧天氣寒冷，仍相率前往觀賞。⁸⁷接著兩江又赴北平比賽，賽後原預計續往遼寧比賽，但因有兩名隊員生病，加以天氣酷寒，因而中止赴寧的賽程。⁸⁸這段期間，爲再度一飽天津觀眾的眼福，兩江特地折返天津做兩場友誼賽。⁸⁹

此後兩年，兩江實力不斷增強，遠征各地莫不載譽而歸，因此不少地區特邀該隊前往表演。1933-1936年間，兩江曾先後出師華南、華中等地，與廈門、香港、集美、漢口、安慶、蕪湖和青浦的球隊進行友誼賽。⁹⁰其中在青浦的兩場比賽曾轟動全城，蓋該地尚無女子籃球隊，兩江的對手是兩支男子球隊；爲一睹球員風姿，觀者人山人海，各娛樂場所也因此停止營業。⁹¹此外，爲倡導國內女子體育，兩江曾主動集合該校童訓班和師範科三年級學生組隊至京滬等地做友誼賽，使蘇州、無錫、鎮江和南京等校的校隊、教師聯隊有機會與該隊較量。⁹²

同此時期，兩江球隊又遠赴國外訪問，首先於1931年至日本、朝鮮進行多場友誼賽。⁹³在日本的比賽僅有一場採女子規則，因此出戰10場未能全

天津《大公報》，1930年10月24日，版8。

⁸⁷ 〈兩江女籃球隊在津獲勝〉，《申報》，1930年10月29日，頁10；〈兩江籃球隊在津又勝〉，《申報》，1930年10月30日，頁8；〈兩江籃球隊又勝兩場〉，《申報》，1930年11月1日，頁11。

⁸⁸ 〈兩江北征籃球隊獲勝紀〉，《申報》，1930年12月5日，頁9。

⁸⁹ 當兩江赴北平賽球時，有天津市民因未及觀賞該隊球技而特至北平觀賽，爲此，該隊再度折天津賽球。此期，該隊先後與天津女子師大混合隊及兩江校友指導的小羊隊進行友誼賽。〈兩江北征籃球隊獲勝紀〉，《申報》，頁9。

⁹⁰ 在華中的12天中，共計出賽10場。〈兩江籃球隊出征閩粵〉，《申報》，1933年6月22日，頁14；〈兩江女校籃球隊凱旋〉，《申報》，1933年8月11日，頁14；〈兩江籃球隊奏凱：遠征華中戰績〉，《申報》，1936年12月26日，頁8。

⁹¹ 首場觀眾約三、四千人，而第二場竟多達五千人之多。〈兩江籃球隊由青返滬〉，《申報》，1935年1月19日，頁16。

⁹² 〈兩江女籃球隊今晨遊京滬線〉，《申報》，1934年12月10日，頁13；〈兩江在錫三戰三勝〉，《申報》，1934年12月14日，頁14；〈兩江籃球隊在鎮又勝〉，《申報》，1934年12月18日，頁14；〈兩江女體師籃球隊在京三戰三勝〉，《申報》，1934年12月21日，頁14。

⁹³ 〈兩江籃球隊將遠征東京〉，《中央日報》，1931年4月22日，張3，版2。

勝，而是 6 勝 4 負。⁹⁴其間又因旅途疲乏與不適室外比賽而中途棄權。⁹⁵但此係兩江首度出國，有此成績已相當不錯。其後赴朝鮮則是每場均勝。1935 年該校復至東南亞等地比賽，東南亞之行是應岷里拉（案：岷里拉即馬尼拉）華僑體育協會之邀，參加嘉年華會的球類比賽；賽後再轉東南亞其他大城市觀光，並與當地球隊進行友誼賽。⁹⁶在近兩個半月間，該隊一共出賽 38 場，雖僅有 7 場是採女子規則，成績仍十分可觀，勝 32 場敗 6 場，這 6 場的挫敗係因與男子隊作戰，競爭過於激烈，導致體力不勝而小挫。⁹⁷基於兩江隊的盛名，該隊所到之處，當地留學生或華僑名流無不竭誠觀迎，給予熱情的支持與招待。此外，遠征不僅有助國人女籃聲名的遠播，同時，也對女子體育較不發達的地區有激勵的作用。⁹⁸值得一提的是，女子球賽雖然較男子球賽起步的晚，海外出訪卻不落男子球隊之後，兩江的首次出訪僅較男隊的遲 5 年。⁹⁹

然而類此遠征並非每次都能順利成行。1933 年正值日本侵華、國難方殷之際，兩江提出環遊歐美的空前計劃，擬藉此行發揚民族精神、觀摩世界體育及聯絡各國國民感情。¹⁰⁰該校並強調：

為使世界明瞭我國之進步，認識東方行將復興之民族。敝隊擬於遍遊他鄉，參觀其體育設施之前，更將歷年刻苦修成之球藝，與世界士女一較身手，……使知我國婦女，已非自甘雌伏，而欲顯身於世

⁹⁴ 另有一場是男女規則各半。〈兩江女校籃球隊東征記（五）〉，《申報》，1931 年 5 月 19 日，頁 8。

⁹⁵ 〈兩江女校籃球隊東征記（五）〉，《申報》，頁 8。

⁹⁶ 〈兩江籃球隊南遊經過〉，《申報》，1935 年 5 月 27 日，頁 12。

⁹⁷ 〈兩江籃球隊南遊經過〉，《申報》，頁 12。

⁹⁸ 〈兩江女校籃球隊東征記（三）〉，《申報》，1931 年 5 月 12 日，頁 12；〈兩江籃球隊南遊經過〉，《申報》，頁 12。

⁹⁹ 1926 年上海聖約翰大學訪日，是國人首次出訪。上海體育志編輯委員會編，《上海體育志》，頁 525。

¹⁰⁰ 兩江環遊歐美計劃大綱的宗旨如下：一、發揚中國民族精神、聯絡世界婦女感情、增進我國之國際地位；二、觀摩世界教育之狀況與體育之設施，以作國內體育實施之參考。〈兩江籃球隊——環游歐美計劃大綱〉，《申報》，1933 年 2 月 10 日，頁 16。

界婦女……。¹⁰¹

此一計劃經披露後，引起各界不同的回響，例如美國紐約業餘體育會、中華體育協會名譽幹事沈嗣良及上海市長吳鐵城等相繼支持；¹⁰²但也有持反對言論者，不贊成的理由來自對耗費鉅資遠行的不滿。籃球健將潘月英指出帶領少數籃球人才遠征「是以虛榮為先急之務，而以學校本身無足輕重之事」，因此潘建議為普及體育教育，該校應將募得的出國經費，撥交學校建設。¹⁰³另外署名「現人」的作者在《大公報》為文諷刺，兩江西征係在聯絡中美感情，但兩江早年曾到過日本，並和日本建立情誼，而今卻未有日人相助；「現人」又認為出國鉅款不應平白浪費，應該用在軍事或體育的設備上。¹⁰⁴由於反對的聲浪較大，加以經費籌措不易，兩江遂放棄這項計畫。

毋可否認的，兩江的傑出表現，使她們有機會南征北討，於三〇年代前期出盡風頭。不過，隨著其他精英球隊的相繼產生以及邀請賽的盛行，三〇年代的中期，至他省市賽球的球隊日增，例如上海的華東女中、東南女體校和東亞體專等校隊曾先後外征。¹⁰⁵其中東南女體專更受各界矚目，因該校辦學認真，無論田徑或球類運動均脫穎而出，因此當兩江的籃球隊應邀赴東南亞賽球之際，該校的田徑隊和籃球隊也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華僑邀

¹⁰¹ 〈中國體育界之空前壯舉〉，《申報》，1933年2月8日，頁17。

¹⁰² 〈赴歐美前之兩江籃球隊〉，《申報》，1933年2月9日，頁19；〈兩江籃球隊補充實力〉，《申報》，1933年2月12日，頁15；〈兩江女籃球隊遠征〉，《申報》，1933年2月13日，頁13。

¹⁰³ 〈潘月英上兩江校長陸禮華書〉，《申報》，1933年2月16日，頁14。

¹⁰⁴ 現人，〈球場漫話：兩江與國難〉，天津《大公報》，1933年2月26日，版10。

¹⁰⁵ 這些球隊以後來居上的姿態擊敗當地精銳之後，遂展開外征之旅。1934年以來，上海的東南體專曾至無錫、華東女中至蘇、杭，東亞體專則至江西、南京、廣州、香港等地比賽。以上參見〈華東女子中學籃球隊今日出征松江〉，《申報》，1934年12月16日，頁18；〈東南女籃球隊挫敗〉，《申報》，1935年1月5日，頁20；〈華東女中：籃球隊征杭凱旋〉，《申報》，1935年5月21日，頁13；〈華東女中籃球隊凱旋〉，《申報》，1935年5月29日，頁13；〈東亞女田徑籃球隊南遊馬來亞〉，《申報》，1935年1月26日，頁15；〈東亞女籃球隊在京二戰二勝〉，《申報》，1936年12月24日，頁10；〈東亞女籃球隊敗於粵女中〉，《申報》，1937年4月20日，頁13。〈轉戰港粵：東亞女球隊返滬〉，《申報》，1937年5月4日，頁10。

請，前往表演兩個月，這期間籃球隊的表現相當優異。¹⁰⁶1937年4月，為切磋球藝，東亞體專的女子籃、排球隊，也有港粵之遊，比賽成果甚為可觀；較為遺憾的是，女排球員因旅外甚久，體力不支，竟敗於實力不及粵隊的香港隊。¹⁰⁷

總之，球員產生後的任務是參賽，因此女球員的活動場所不限於學校，校外的球場、運動場都是她們演出的空間，此期的球賽有正式與非正式兩種，正式球賽分由不同的運動組織舉辦，包括國際性、全國性、地方性及校際間的各種競賽，因此女球員賽球的對象相當廣泛，有本國人也有外國人。非正式的球賽不是友誼賽便是邀請賽或表演賽，友誼賽主要在切磋球藝以擷長補短，邀請賽含有傳遞球技的用意，表演賽則多半屬應酬性質。此外，聲名遠播的球隊更遠征至異域，例如兩江女籃隊在三〇年代前期曾在國內南征北討，同時也出征至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地。值得一提的是，此期有不少球賽是採混合對打的方式，既無性別之分也無學制之別，惟男女對打的球賽多半出現在非正式場合。紛至沓來的球賽讓女球員展現球技的機會大為增加，其中精英女球員更是身負重任，備受各界矚目，致使女球員的生活充滿緊張、刺激。

四、球賽對女球員與大眾的影響

球賽讓球員有機會馳聘球場、展現球技並從中改進技術，而隨著球賽產生的規程及相關活動，進而影響球員的行為舉止和知識見聞。二、三〇年代陸續設立的運動團體幾乎都訂有比賽規則，詳細規定會制、會費、賽規、服裝、球員資格及球隊人數，這些規範不僅有助於球賽的進行，且具有制約球隊和球員的作用。其中球隊的出席與否因攸關賽程，每個組織團體為此訂

¹⁰⁶ 9場比賽中，除曾受挫培風男子隊之外，其他各場無不獲勝。另有一說是籃球比賽有二十餘場，挫敗兩次。以上參見〈東亞女籃球田徑南游〉，《申報》，1935年3月21日，頁15；〈東亞南遊成績〉，《申報》，1935年3月29日，頁14。

¹⁰⁷ 在8場比賽中，籃賽是4勝1敗，排賽則2勝1敗。〈轉戰港粵：東亞女球隊返滬〉，《申報》，頁10。

有嚴格的規定，1929年「上海女籃會」曾要求球隊「如遇特別事故不能如期比賽時，須徵得對隊之同意，先一日繕具理由書，派人向主席委員申請改期，否則作棄權論」，再者「棄權一次，扣除保證金五元，棄權兩次，保證金沒收」。1933年，該會將此項規定進一步修訂爲「球隊棄權一次，沒收保證金；棄權兩次，即取消其會員資格」¹⁰⁸至於在規定時間內不出場比賽的球隊，每個組織都視之爲棄權，鮮少寬待。¹⁰⁹早期確實有球隊無法墨守成規，怯場或無故缺席的球隊時有所聞，但至三〇年代，這種現象大幅改進，球隊在萬非得已下才會宣告棄權。在1933年的「上海女籃會」中，兩江的兩兩隊曾棄權一次，棄權的原因是路程遙遠，加以沿路車行遲緩以及交通號誌阻梗，致使該隊以遲到一刻鐘退出比賽。¹¹⁰

另外，有的團體尙規定「球員中有未報名及未繳照片者，不得參加比賽，違者取消該球員所屬球隊之比賽資格；再如中途退出或被罰出會者，保證金不發還，且所得之比賽分數，亦同時取消」、「比賽用球，採用國貨」、「比賽後洗澡應用毛巾，均須自備」。¹¹¹而第五屆「全運」對包括球員在內的全體運動員訂出〈運動員十不要與十要〉的標語：（一）不要晏起晏睡，要早起早睡而又有定時；（二）不要貪口腹，要少吃而多嚼；（三）不要始勤終惰，要到底不懈；（四）不要畏難，要百折不回；（五）不要爭勝，要有真正工夫與實在力量；（六）不要欲速，要漸進不已；（七）不要飲酒抽煙，要淡泊；（八）不要好色縱慾，要寧靜；（九）不要貪財好貨，要廉潔；（十）不要僥倖犯規，要遵守運動員之道德及比賽時之規則。¹¹²值得一提的

¹⁰⁸ 〈上海中華女子籃球會章程〉，《申報》，1929年3月19日，頁11。

¹⁰⁹ 〈上海女子籃球會定本月十一日開幕〉，《申報》，1933年11月6日，頁13。

¹¹⁰ 其中除「中校體聯」曾對車輛中途發生事故者予以通融之外，其他會規通常規定超逾5或10分鐘即視爲棄權。以上規定參見〈上海女子籃球會續訊〉，《申報》，1929年11月23日，頁17；〈中校體聯昨開臨時會議〉，《申報》，1935年11月25日，頁12；〈亞青女子籃球會強南崇德加入〉，《申報》，1929年12月10日，頁9；〈上海女子籃球會定本月十一日開幕〉。

¹¹¹ 〈女籃會閉幕〉，《申報》，1933年11月28日，頁12。

¹¹² 〈申報〉，1933年10月10日，頁35。

是，上述各類規定，並無性別差異，易言之，身為球員無論男女都必須有守時、守紀、講究衛生、遵守道德與具備愛國的觀念。儘管很難確知每位女球員所受到的影響程度，但為配合團隊行事，女球員的生活習慣或認知多少會因此而改變。

女球員經由會規不但學習規範，也從中懂得如何挑戰並爭取權益，而這種情形多半出現在冠亞軍賽。為贏得錦標榮譽，雙方球隊嚴密監視對手是否有違規情事，其中球員資格便深受關注。屬業餘性質的球會通常禁止非業餘球員加入比賽，惟儘管有這類規定，仍無法防範資格不符的球員入會。¹¹³有鑑於此，大會必須主動調查或接受球隊的質詢。1930年，兩江隊曾在上海市運動會中拱手讓出錦標，便是因球員席均曾任體育教員不符大會規定，經大會質問，兩江惟有宣布棄權。¹¹⁴1933年上海市運動會的女排賽中也曾發生同樣情形，在海星隊與務本隊的比賽中，民立隊發現海星的球員郭筱萍違反業餘資格，隨即向大會反映，雖然民立的抗議未果，但顯示球員對權益的重視。¹¹⁵

裁判的公平與否更是受到矚目，也因此球場上常出現球員與裁判員（或稱公正人）的對立鏡頭，致而衍生違規事件，甚至毆打裁判的暴力行為。¹¹⁶雖然女球員的表現未曾粗暴至此，仍可看到劍拔弩張的場面，或全體退場或提出抗議。¹¹⁷在諸多爭端中，以和外國人的比賽問題最多，1930年的「西

¹¹³ 「上海女籃會」曾規定：「凡上海各學校或其他業餘球隊之得本會承認者，均得為會員」，「本會組織係業餘性質，故凡球員之不合格者，不得加入比賽」。以上參見〈上海女子籃球會續訊〉，《申報》，1929年11月23日，頁17。

¹¹⁴ 〈昨籃球結果〉，《申報》，1930年3月15日，頁15。

¹¹⁵ 經大會調查，郭固然任教小學。但未教授體育，故其資格並未抵觸大會規定。〈滬市運動會球賽〉，《申報》，1933年9月19日，版14；〈務本得女子排球錦標〉，《申報》，1933年9月25日，頁15。

¹¹⁶ 1934年，在「江大」足球比賽中，交大因敗北而遷怒裁判員，致有學生毆打裁判成重傷的不幸事件。宸，〈體育訴訟〉，《申報》，1934年3月8日，頁1。

¹¹⁷ 在1934年「遠運」會的中菲排球戰中，因裁判心存偏頗，導致我女球員氣憤填膺，怒不可遏，全體退場休戰。〈裁判不公怒不可遏〉，《申報》，1934年4月16日，頁15。

青女籃會」曾發生兩起中華隊憤而離場的事件。¹¹⁸事實上根據球會規定，球隊可以採書面抗議方式，惟這段期間，球隊多半未訴諸大會給予合理解決。¹¹⁹直到球場經驗日漸豐富，遇到不公平的裁判時，始不再主動棄權，而是據理以爭，例如 1933 年兩江隊曾因西僑裁判裁奪不公，正式向大會提出抗議，要求撤換裁判。¹²⁰對已是沙場老將的兩江隊言，長期的球場經驗讓該隊不願輕易俯首稱臣，即使這幾場比賽僅是純友誼賽。1934 年，「遠運」舉辦中菲女排賽時，中華隊也曾因裁判不公正，檢具兩點理由，以書面方式向大會提出抗議。¹²¹

會規之外，球賽的實際活動讓球員的人際網絡、知識見聞或西化程度跟著起伏變化。以人際網絡言，藉由球賽可以促進球藝，又能增長友誼。大者如建立校際與班際間的關係，小者是與三兩知己結爲莫逆。¹²²崇德的籃球名將甘福和葉福基便有深厚的姐妹情誼，據描述，她們結識多年，自小便是同級同學，不僅坐位相鄰，無論在校內、外均可見其二人同進同出。¹²³女球員既和同性相交往，也與異性球友相往來，人際關係較其他女同學寬廣。有時球員還得參加各式交際應酬，特別是由「全運」或「遠運」舉辦的球賽，以及與外地或國外球隊進行的友誼賽，球賽主辦單位通常會在球賽之後宴請

¹¹⁸ 〈女子籃球賽〉，《申報》，1930 年 2 月 15 日，頁 17；〈昨日女子籃球賽：強南與麥令不歡而散〉，《申報》，1930 年 2 月 20 日，頁 11。

¹¹⁹ 中青籃賽中，曾規定「如不幸遇有抗議事件，須用書面於事實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送交本委員會，並隨繳保證金五元，如委員會認該抗議且有充分理由者，當將保證金發還，否則沒收，惟委員會之判決爲終決，不得再有異議」。以上參見《申報》，1934 年 12 月 6 日，頁 15。

¹²⁰ 據兩江校長陸禮華表示，兩江的失敗是裁判員偏私、不公平，對西僑隊應罰而不罰，遂使兩江英雄無用武之地。〈兩江敗於西聯〉，《申報》，1933 年 2 月 25 日，頁 15；〈兩江女籃球隊戰划船綠隊〉，《申報》，1933 年 2 月 27 日，版 11。

¹²¹ 抗議理由：（一）末盤十五對十三時，敵球過來，裁判鳴笛，我隊員因而將球接住，裁判竟判我失分，時菲已得十五分，縱我失分，菲亦只應增加一分，而紀錄板竟加二分；（二）菲十九分時，來球已跌出界外，裁判反認爲正球，判菲得分。〈中菲女排球賽：裁判員不公〉，北平《晨報》，1934 年 5 月 17 日，版 11。

¹²² 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85，Chang Lee Chu, 'Sports Teams', 《丁丑年刊》（1937 年），頁 286；〈初中二痛飲黃龍〉，《德音半月刊》卷 2 期 5（1933 年 4 月），頁 128。

¹²³ 〈崇德籃球隊內的一對好友〉，《申報》，1929 年 8 月 10 日，增刊，頁 7。

球員，由於這類應酬是男女不拘，女球員一樣受到邀請。此外，球員也參與球賽無關的活動，例如協助體育影片的拍攝，1934年轟動上海的電影〈健美運動〉便有東南和兩江學生表演運動的鏡頭。¹²⁴無疑的，社交活動讓女球員世面大開，日常生活連帶著多樣而複雜，致有球員梁麗芳流連社交場所不再參加球賽的例子。¹²⁵

以知識見聞言，經常至外地賽球的球員，因交際面廣，知識見聞無形增長，而至國外賽球的球員更是得天獨厚。東亞女體專赴港粵賽球時，該球隊負責人即表示，香港之行讓她們印象深刻，由於與西方人多所接觸，無論在運動精神或技術上都得到深切的認識。¹²⁶同時，從旅途中，球員可以參觀到各地的名勝古蹟、民情風俗或新奇事物。隨兩江隊外訪的《申報》記者黃寄萍在〈兩江女校籃球東征記〉一文中，曾將球隊沿途所見的日韓風情及兩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等一一記載，儘管這些觀察不是來自兩江球員，但從該文可以得知，此次出訪讓兩江球員體驗到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¹²⁷另外，兩江隊南征時是乘豪華郵輪前往，該隊球員冷雪（案：應是陳白雪的筆名）將郵輪上參觀到的各種現代化設備一一記載。¹²⁸這些活動讓女球員眼界大開，使她們較其他女性先一步獲得近代化的洗禮。

以西化程度言，籃、排球運動傳自西方國家，球員必須接受西方國家所制定的各種球規和賽球方式，並得嫻熟球賽所使用的英文術語，否則無法

¹²⁴ 費念祖，〈「健美運動」我評〉，《申報》，1934年11月22日，增刊，頁9。

¹²⁵ 參見〈附錄一〉。

¹²⁶ 〈轉戰港粵：東亞女球隊返滬〉，《申報》，頁10。

¹²⁷ 黃記載道：「愚等留日，雖為時至暫，而耳目所及，千端萬緒，……簡括言之，如舟車交通之靈便，工商事業之興盛，教育體育之普及，社會秩序之安定，似可與歐美諸先進國家並駕齊驅，……日本西部鄉間農產物，就車中所及，則以稻麥桑茶為大宗，民間生活似甚安樂，……路旁學校，每行三四里，必有一所，校舍甚簡樸，而運動場之設置，較吾國城市學校尚完備，工廠不限於城市，鄉間亦所在多有，日本工業之發達，於此可見一斑。……韓人男女老幼，皆衣素服，冬夏不變，城鄉所見者，大半勞工，頂負巨物，或肩荷重載，淒涼景象，滿目皆然，同一鄉村，而彼此判若天壤，此殆國家強弱所使然歟。」。黃寄萍，〈兩江女校籃球隊東征記〉，《申報》，1931年5月22日，頁8。

¹²⁸ 冷雪，〈兩江籃球隊南征日記〉，上海《時報》，版7。

瞭解裁判員或其他球員的語言。前述民立與大夏會戰時，裁判員曾用英語高呼：「Once More Sir（再一次，先生）」，因聲調急促，在場觀眾誤聽爲「黃包車」（One Bore Chow）。¹²⁹顯而可見的是，球員若不明其意，這場球賽必然無法進行。有趣的是，女球員除在球場上使用英語，也將英語帶入日常交談中，爲如實報導球員生活，有的專欄記者以中英雙語夾雜的方式呈現球員的話語，例如「搏九」記載 1929 年中國公學的健身房清晨的一幕：

Ball, Here; Ball, Here 的嫩嫩底鶯聲，……不斷地吹向我們的耳鼓來了。¹³⁰

上海《時報》報導「江大籃球」比賽時場外球員的一段對話：

「……，她打籃球打得很好，跳 center，你也是嗎？」

「我也是中鋒，不過腳傷了。」¹³¹

雖然 1933 年「全運」籌備委員會認爲，運動場中使用英語會降低民族自信力，應將術語譯爲中文，並規定無論職員、裁判員和運動員皆不准使用英語，但事實上仍有實行上的困難。¹³²例如中國各地方言分歧不一，在「全運」會中，使用英語始能消除球員間或球員與裁判間的語言障礙，使球賽順利進行。而參與國際性球賽的球員更需要通曉英語，經常與西僑賽球並遠征國外的兩江球員便慣用英語，甚至將英語生活化，從冷雪的〈兩江籃球隊南征日記〉一文可以看到，述及專有名詞時，白雪似無法避用英文。¹³³且不論女球員在語言上的西化程度是深或淺，可以理解的是，球員至少要能聽能說球場的英文術語；而在會講洋文是象徵摩登的三〇年代，女球員顯然隨著球賽登上摩登的行列。

球賽活動同時也讓女球員有機會示範球技，與其他地區的球隊交流。經常遠行的兩江隊便在這方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1930 年該隊至平津比

¹²⁹ 〈民立女中與大夏混合隊之排球戰〉，《申報》，增刊，頁 5。

¹³⁰ 〈中公女子籃球隊〉，《申報》，增刊，頁 7。

¹³¹ 〈江大籃球：復旦中央金陵〉，上海《時報》，1934 年 3 月 20 日，版 7。

¹³² 〈全運會術語不准用英語〉，《申報》，1934 年 8 月 23 日，頁 16。

¹³³ 這些名詞諸如交際室(Social Hall)、送別會(Farewell party)、及演員約翰保傑斯(John Bojes)，參見冷雪，〈兩江籃球隊南征日記〉，上海《時報》，1935 年 2 月 18 日，版 7。

球時，張伯苓於閉幕會中曾致詞表示：

兩江隊技術優良，精神仁俠，可為全國模範，並希本市得此番之觀摩之後，共起提倡女子體育。¹³⁴

言畢又頒給該隊一面錦標，書著「倡體敦誼」四字，充分顯示該隊在球技傳遞上的貢獻。¹³⁵該隊遠赴東南亞地區時，陸禮華也表示，該行程一則在視察該校畢業生於東南亞各地的服務情形，另則宣傳國人的體育精神並與當地球隊切磋球藝，以達成 1933 年歐美行的部分宿願。¹³⁶

此外，有些球員還藉這些活動從事國民外交，據冷雪的表述，在前往東南亞的郵輪上，她曾與一位美籍乘客閒聊，卻發現對方眼中的中國女性是早婚的，白雪的反應是：

我告訴他關於我們這次的出征及近代女子的婚姻年齡，……至少要給他知道中國女子並不是他所想像的中國女子。¹³⁷

白雪的目的不外是要扭轉西方人對中國女性的壞印象，並改變他們從舊禮教來認識中國近代文化；無論「白雪」的解釋是否產生作用，就「白雪」觀察，對方很敬重的聽她陳述。¹³⁸

值得一提的是，球賽是一種公開活動，為贏得觀眾的好感，女球員不僅向觀眾展示球技，且講究外觀，甚至以摩登、新派的裝束引領風騷。以髮式言，在 1927 年的「遠運」會中，代表中華隊的華東女排球員是全體短髮，與束著髮辮的日本女選手截然不同，頗受觀眾注意，記者林澤蒼引胡適的話指出，日本各界反對剪髮，並取「摩登」（Modern）的諧音，諷刺短髮為「毛斷」，林因而認為中華球員梳短髮是新女性的標幟。¹³⁹至於球員的服裝，早期女球員較為保守，上穿運動衣、下著及膝的燈籠褲，而這時期漸有球員

¹³⁴ 〈戰女師：兩江再獲勝〉，天津《大公報》，1930 年 10 月 31 日，版 8。

¹³⁵ 〈戰女師：兩江再獲勝〉，天津《大公報》，版 8。

¹³⁶ 陸禮華，〈陸禮華南遊觀感錄〉，上海《時報》，1935 年 6 月 6 日，版 8。

¹³⁷ 冷雪，〈兩江籃球隊南征日記〉，上海《時報》，版 7。

¹³⁸ 冷雪，〈兩江籃球隊南征日記〉，上海《時報》，版 7。

¹³⁹ 林澤蒼，〈余之會場見聞〉，《申報》，1927 年 8 月 28 日，頁 12。

著短褲。1932年上海中央運動場參賽的女選手除蓄短髮之外，穿著白衣黑褲、軟底鞋和短統襪出場，儘管這是國際球賽中女運動員的一般打扮，但在國內尚屬新奇，因此即使生活在開風氣之先的上海觀眾，仍視之爲當年最摩登的式樣。¹⁴⁰此外，有的球員則以濃妝艷抹亮相，從兩位女球員出賽前的一幕即見一斑：

球員的因和眉，一早就穿起特製的球衣，被褥只馬虎的清理一下，便抹著紅紅的脂粉，還畫著濃黑的眉。¹⁴¹

廖星在〈爲的什麼呢？〉一文也對一群在球場練籃球的球員做如下描述：

一隊是白色運動衣，白衣間著藍條子「燈籠褲」，每一個都具備著摩登女郎的條件：燙髮，塗上一層厚厚的脂粉，波狀的黑髮上一律紮著一條鮮赤的紅絲帶。另外一隊除了運動褲是黑色以外，就幾乎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不過紮絲帶的比較少點。¹⁴²

球賽形勢加上球員的妝扮使觀眾目不暇給。¹⁴³1933年上海《時報》的記者參觀江蘇省第三屆省運會的女運動員宿舍時，發現牆隅地角堆滿運動員的化妝品，無不咋舌。¹⁴⁴事實上，無論是短髮、燙髮、裸臂露腿或塗脂抹粉是三〇年代大都會新派女學生與新女性的時尚，女球員身上所反映的正是這種流行文化，同時她們也將時髦帶給觀眾。¹⁴⁵

¹⁴⁰ 葉華女士，〈體育表演記〉，《申報》，1932年6月21日，頁13。

¹⁴¹ 曾迺敦，〈第八章：競賽與表演〉，《女學生生活素描》（上海：女子書店，1936年），頁46。

¹⁴² 廖星，〈爲的什麼呢？〉，《女青年月刊》卷13期6（1934年6月），頁33。另外，「拾遺」也發現每次開運動會或球類比賽時，「多數女運動員的臉上是染著脂粉的，細細的眉，是用黑色描上的！更致把頭髮弄得捲曲，身上穿著艷色的服裝，手腕上戴眩目的手鐲！」。參見拾遺，〈今日女運動員的病態〉，《國民體育匯刊》期1（1936年1月），頁32。

¹⁴³ 廖星表示，球場上「急喘之聲時有所聞，形勢煞是好看，在我眼前閃來躍去的，只是飛揚著的長長的黑髮，紅的，黃的，黑的，各色絲帶的末梢，就只這些便足夠人們的喝采了。」。廖星，〈爲的什麼呢？〉，《女青年月刊》，頁33。

¹⁴⁴ 〈參觀女運動員宿舍〉，上海《時報》，1933年9月20日，版8。

¹⁴⁵ 根據陶希聖先生的觀察，1928年上海的女性傾向剪髮；而30年上海女性時興裸臂露足，引自陶希聖，〈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上海：新生命書局，1931年），頁340-341。另

除了公領域之外，球員的角色使女球員在私領域中有寬闊的揮灑空間，彰顯球技之外的其他才華，從〈附錄一〉和〈附錄二〉中可以看到，多數女球員興趣廣泛，不僅喜愛的運動不止一項，甚至還擅長音樂、舞蹈、表演或書法等。例如東南體專的沈文英即文武兼備，既是籃球健將又精通田徑和網球，同時也能歌善舞。¹⁴⁶其他如東南體專的孫仿倫、東吳大學的狄潤君、愛國女學的石水英以及滬江大學的鄺文偉、張如怡等人都身懷絕技。無疑的，出色的球技讓她們更有機會表現，並成為球場或校園的焦點人物。

由是顯示，球員生涯帶給女球員不同的體驗，而且影響深遠，惟對這群來自校園的女球員言，這種生涯畢竟是要隨著學業結束而告終。儘管如此，有的球員並不因脫離球員生涯而減低對球賽的熱衷。有球員透過教學工作傳薪給下一代，其中以體專出身的球員居多數，據 1929 年 8 月的報導，東南女體專的當屆畢業生除許蘭英之外，其餘 23 名畢業生均先後獲得教職。¹⁴⁷同時這些球員的教學成果卓著。如 1935 年上海市舉辦小學運動會，其中女子錦標分別為務本和廣肇兩所小學獲得，而這兩校學生的體育教練均曾是東南女體專的籃球健將。¹⁴⁸另如兩江名將邵錦英婚後隨夫婿至廣東省立體專，在該校教授韻律和柔軟體操，深受學生愛戴。¹⁴⁹有的球員則繼續展現球技集結志同道合者組織球隊，參加非正式比賽，這些球隊有私立校友隊與黑鷹隊等。¹⁵⁰其中私立校友隊的表現特別吸引大眾注意。

外，莊啓英指出修飾、美容是當時大學生的一種生活，特別是女同學「差不多終日沈迷塗脂抹粉中」。莊啓英，〈大學生活〉，《滬大周刊》卷 21 期 6（1933 年 12 月 15 日），頁 15。

¹⁴⁶ 〈安徽五中新聘體育教員沈文英〉，《申報》，1929 年 8 月 10 日，增刊，頁 7。

¹⁴⁷ 根據東南女體專 1929 年 8 月的資料，首屆畢業生計 24 位，其中僅一位尚未覓得教職，其餘均分配至各學校任教。〈一人獨留〉，《申報》，1929 年 8 月 17 日，增刊，頁 7。

¹⁴⁸ 李賢彰，〈體育雜話〉，上海《時報》，1935 年 6 月 13 日，版 8。

¹⁴⁹ 向勤，〈舊中國廣東的兩間體育學校〉，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市荔灣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合編，《廣州文史資料》24 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60。

¹⁵⁰ 黑鷹隊是由東南、崇德兩校校友組成。〈上海市女籃球〉，上海《時報》，1935 年 9 月 21 日，版 7。

私立女排球隊一向在華東排球界享有盛譽，同時曾有球員入選為「遠運」的代表，因此這群球員對排球賽相當執著，儘管畢業後各有所司，她們仍利用星期假日聚集練球。¹⁵¹即使是艷陽高照的酷暑，球員練球不斷，出席者尚比平常多，為的是與暑假期間的各校留校生做友誼賽。¹⁵²練球之外，球員也致力於經費的籌措，向校友會會員、校內的教職員乃至觀眾勸募，使球隊能夠順利發展。¹⁵³有了經費後，私立校友隊賽球的對象更為廣泛，該隊除與女子隊比球之外，又鑑於上海女子隊不足抗衡，而向男子隊挑戰，先後和6支球隊對戰，甚至北上南京，和金陵女大、金陵大學交鋒。在多次比賽中，迎戰男子隊最為不易，惟儘管如此，私立並未全負，曾勝過南洋高商熊隊、南洋英專隊。¹⁵⁴同時，該隊即使敗戰也保持不凡的演出，1929年與金陵大學的一場球賽，私立固然三局均敗北，卻能協力應戰，贏得觀眾的好評。¹⁵⁵

從私立校友隊以在校時期的球賽成果繼續在畢業後施展球技，並再度在當時的球壇造成轟動觀之，球員生涯對部分球員具有極大的誘力，她們很難即時離開這片舞臺。但為不影響其他新興排球隊的球興，上海市第一體育場舉辦女排賽時，曾勸止該隊參與，使該隊失去問鼎錦標的機會。¹⁵⁶不過，隨著球員先後結婚適人，這支球隊在不及半年內解散。

事實上，球賽不僅影響球員個人，也對她們所代表的學校帶來衝擊，尤其是球賽的成績因攸關學校榮譽，因此不少學校視此為大事。以崇德女校

¹⁵¹ 球員中的陳彩鳳、蘇祖琦均曾出席「遠運」，〈暑期中的女子排球練習〉，《申報》，1929年7月4日，增刊，頁7。

¹⁵² 〈暑期中的女子排球練習〉，《申報》，1929年7月4日，增刊，版7。

¹⁵³ 〈私立女中校友排球隊募捐〉，《申報》，1929年7月11日，增刊，版3。

¹⁵⁴ 〈私立女中校友與復旦比賽排球〉，《申報》，1929年6月7日，頁11；〈私立女排球與男子比賽〉，《申報》，1929年7月1日，頁12；〈今日男女排球混合賽〉，《申報》，1929年7月12日，頁12；〈今日男女排球練習賽〉，《申報》，1929年7月15日，頁11；〈男女排球賽：私立校友勝高商隊〉，《申報》，1929年8月3日，頁12；〈私立女校排球隊勝熊隊〉，《申報》，1929年9月8日，頁17；〈私立校友排球勝南洋〉，《申報》，1929年10月6日，頁17。

¹⁵⁵ 〈私立校友女子排球隊赴京戰績〉，《申報》，1929年10月16日，頁12；〈今日返滬之私立排球隊〉，《中央日報》，1929年10月13日，張3，版4。

¹⁵⁶ 〈私立校友女子排球隊到南京比賽〉，《申報》，1929年10月8日，增刊，頁2。

爲例，1932年該校校隊擬至南京，與當地幾所學校進行友誼球賽。校方以此行爲該校創舉，於球隊出發前，特別由校長訓勉球員：「努力練習，勿徒然以勝敗爲念」，並宣布各種規則，交由教員隊長及管理員執行。¹⁵⁷迨至該球隊凱旋返校後，校方又召集全體學生舉行歡迎會，會場還高掛著扁額和對聯祝賀。¹⁵⁸較特殊的是，由於該校是教會學校，這殊榮除歸給國家、學校之外，也歸給神，從對聯中足見一斑：「爲神爲國爲崇德」、「盡心盡力盡忠誠」。¹⁵⁹另外，學校和同學也相當重視球員士氣的鼓勵。在一封〈給籃球隊員的一封信〉中，曾呈現崇德女校校友對該校球隊的關懷：

你們把母校崇德的名，崇德的光，傳到各處去了。從前南京方面，不大認識崇德。但自昨天起，她們都羨慕崇德起來了。……希望你們多爲母校努力。¹⁶⁰

不過，最直接而有效的鼓舞還是來自球場外啦啦隊的助陣，這些啦啦隊有來自學校的指派也有出於同學的自願，對球賽的勝負產生極大的作用。¹⁶¹爲助長各自球隊的聲勢，每個啦啦隊無不費盡心思，採用各式技巧抑壓對隊，其中呼口號或吶喊最爲普遍。¹⁶²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場合喜用女生啦啦隊出馬，例如1931年上海總商會幹員虞永谷認爲女性較能激勵運動健將，因此建議在比賽中組織女子啦啦隊。¹⁶³但在男女同校日盛的三〇年代，男女

¹⁵⁷ 《德音半月刊》卷1期4（1932年10月30日），頁30。

¹⁵⁸ 《德音半月刊》卷1期5（1932年11月15日），頁39。

¹⁵⁹ 《德音半月刊》卷1期5，頁39。

¹⁶⁰ 〈給籃球隊員的一封信〉，《德音半月刊》卷1期5（1932年11月15日），頁46。

¹⁶¹ 《申報》記者曾謂：「二軍勝負，端賴銳氣，啦啦隊之組織即所以鼓勵作戰之精神，而達到勝利目的者也。」〈今日萬人爭看文大暨南決戰〉，《申報》，1929年11月30日，頁12。

¹⁶² 在1929年交大與暨大的足球決賽中，雙方啦啦隊均卯勁助威，其中暨南的男女啦啦隊花樣甚多，除隊長帶動練習，編製凱旋歌、啦啦調之外，女同學還全體化裝出場歡呼，內有滑稽腔，希奇古怪，爲球場增色不少，同時隊中備有鑼鼓、喇叭等助戰。〈今日萬人爭看交大暨南決戰〉，《申報》，頁12。

¹⁶³ 〈組織女子啦啦隊〉，《申報》，1931年1月24日，頁10；但也有人認爲這種組織各校女學生而成的啦啦隊是病態現象，參見〈體育評論〉，《申報》，1934年3月8日，頁1。

同學常採相互助威的方式，這種情形不僅能激勵球隊士氣，且有利兩性關係的建立。復旦大學女籃隊即曾表示，1927年該隊與愛國女校進行友誼賽時，男同學曾經給予極大的助力，致使球隊振足軍容，不為愛國攻破。¹⁶⁴同時，從啦啦隊的助威可以看到球員受到的重視似無性別之分，1930年的「全運」會上，南京啦啦隊鑑於該地男籃隊慘遭滑鐵盧，遂將希望轉寄於女籃隊，該項比賽雖僅是初賽，但啦啦隊仍呼喊甚力。¹⁶⁵同樣情形也曾出現在1934年的萬國女籃賽中，在男籃隊挫敗後，觀眾對女籃隊抱持厚望，不斷為女籃隊吶喊助威：終榮獲籃球錦標，而報紙也以「中華女兒果為鬚眉吐氣」稱頌女籃隊。¹⁶⁶漢公的〈體育外史〉更以故事手法描繪男啦啦隊對女球員的恭謹，該文雖屬虛構，卻充滿著女球員威風八面的暗喻。¹⁶⁷

有趣的是隨著球賽的風起雲湧，加上明星球員角色的重要，會打球或當女球員成為社會時尚。向來走在時代尖端的女明星表現尤其積極，有的明星興起組織球隊的構想，1934年胡笳和胡萍兩女明星曾在電影界發動組織籃球隊的聯署活動；胡笳認為目前不少婦女都在提倡運動，電影界女性卻依舊沈醉在「病態美」中，因此登高一呼。¹⁶⁸有的明星則喜做球員打扮。因〈體育皇后〉一片走紅的影星黎莉莉，曾穿著繡著「10號」的球衣和南洋高商的籃球隊一道出現在大夏大學的球場上，並以前鋒的角色在球場上跑跳，引起該校學生的圍觀。¹⁶⁹無疑的，黎的表現純為噱頭，但可以理解的是，這種

¹⁶⁴ 〈女生籃球隊，大勝愛國〉，《復旦旬刊》創刊號（1927年11月），頁84-85。

¹⁶⁵ 〈初賽結果〉，《申報》，1930年4月5日，頁18。

¹⁶⁶ 〈中華女兒果為鬚眉吐氣〉，上海《時報》，1934年3月23日，版8。

¹⁶⁷ 該文敘述道：「號稱紫金城的女生宿舍，發出一陣笑聲來，門口停著四輛山馬大學自備汽車，汽車引擎軋軋響了，……車頭上高高插上一面紅旗，……刺繡「山馬大學女子籃球隊」九字，……第一輛壓道車當然是男子啦啦隊，中間兩輛不想可知，定屬女性所有，最後保鏢式的一輛，王省三領隊，大唱敬祝勝利歌，這一路上浩浩蕩蕩，威風不可一世。……山馬大學女運動員下車後，啦啦隊先呼後應，王省三用了生平之力，讓開一條肉路，女將們心猶不足，尚嫌太窄，其中有一個較小一點的居然異想天開，想令啦啦隊背進去，這事終因不雅觀，卒得忍氣吞聲，姍姍進場」。漢公，〈體育外史（續）〉，《體育周刊》期2（1931年10月30日），頁11。

¹⁶⁸ 波浪，〈胡笳組織籃球隊〉，《申報》，1934年1月13日，頁5。

¹⁶⁹ 俊，〈黎莉莉在大夏表現籃球〉，上海《時報》，1933年11月13日，版2。

行為完全來自大眾對球員著迷所致。

較重要的是，女球員既然來自學校，球賽風氣究竟對一般學生帶來何種影響，儘管不喜歡球類運動學生俯拾可見，愛好運動的學生也逐漸增加，特別是對球類運動的喜愛。根據 1932 年松江女中師範科學生的調查，該校的 95 名學生中有超過五成喜當籃球員。¹⁷⁰而 1934 年嘉興地區學生的一份調查也顯示，嘉興、中山和明德三所女中學生最感興趣的功課，除國語、英語、算學之外，便是體育；至於最有興趣的運動則為籃、排球。¹⁷¹影響所及的是，不少校園中充滿球賽的氛圍，每有大型運動會時，球員熱中練球，非球員則熱中看報紙消息，由於女學生對球員名字耳熟能詳，一旦在報上讀到她們的名字，不是驚歎就是狂呼，亢奮至極。¹⁷²受學生影響，有的教師也忍不住技癢，組成球隊與學生比球，教師的這種行動無形中激勵更多學生投入活動。¹⁷³不過，師生間的球賽偏重趣味，多半不重視成果。1935 年 1 月，聖瑪利亞女校的健身房曾舉辦一場逗趣十足的師生籃球友誼賽，當天教員刻意打扮成老人緩緩進場，令在場學生絕倒；然後再以矯健的身手出戰。雖然教員隊大敗，但那近 1 小時的比賽是在笑聲中進行，觀戰的每個人無不興奮。¹⁷⁴顯見球員的活動不僅及於球員本身，並感染給她們周遭的群眾，特別是校內的師長和同學。

¹⁷⁰ 這是來自松江女中高中師範科三年級生的「本校學生職業興趣調查」的報導，在包括初、高中普通科及高中師範科的 95 名學生中，有 31 名學生喜歡的職業是當籃球員。高師三統計，〈本校學生職業興趣調查〉，《松江女中校刊》期 29（1932 年 6 月），頁 7-10。

¹⁷¹ 接受調查的學生，嘉女計 195 人，中山 76 人，明德 42 人，喜歡體育的依次是 12 人、10 人、4 人，而對籃球感興趣的嘉女 77 人、中山 16 人、明德 9 人，至於排球分別是 17 人、32 人、3 人。以上參見許敏中，〈嘉興中等學生生活狀況及其志願的調查〉，《中學生》號 44（1934 年 4 月），頁 10、15。另外，據 1931 年松江女中的資料呈現，在 16 種運動項目中，最感興趣的運動也是籃、排球，分別占學生總人數的 78% 和 72%。參見《松江女中校刊》期 19-20 合刊（1931 年 6 月），頁 44。

¹⁷² 子岡，〈北平的女學生（上）〉，《女聲》卷 3 期 2（1934 年 10 月），頁 5。

¹⁷³ 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108，劉珍寶、嚴蔚雯，〈我校籃球隊小史〉，《啓秀年刊》，無頁碼。

¹⁷⁴ 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139，戴閩雄，〈師生籃球友誼賽〉，《鳳藻》（1936 年），頁 192。

總之，女球員的生涯不但忙碌，受到的影響也是多元的。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來自球場，為遵守球賽規定，女球員必須接受各種規範，而且懂得如何挑戰和維護球隊權益，例如糾舉資格不符的球員、挑戰不公正的裁判。此外，經由球賽活動，女球員得以建立不同的人際關係、增長球技之外的其他知識見聞；特別是經常至異域賽球的女球員獲益尤多，這些球員甚至從事示範球技、傳遞中華文化的交流工作。公開的球賽活動讓女球員成為公眾人物，勇於表現自我，除呈現球技之外，有的女球員還將時髦帶給觀眾，或展露其他才藝，得到更多的注意。儘管學業結束也是球員生涯的終止，仍有球員懷著球技在教壇或球場活動，繼續球員生涯。其實球賽不僅影響球員個人，並為學校及社會大眾帶來衝擊，對學校言，球隊的勝敗攸關學校榮譽，女球員受到的重視自然無可言喻，比賽時有啦啦隊助陣，凱旋返校後復有同學為之慶賀；同時，校園不時籠罩球賽的氛圍，班際比賽、師生競賽層出不窮。至於一般大眾也視打球和當球員為時尚。

五、社會大眾心目中的女球員

當清末民初的女學生與職業婦女等新女性開始在公眾場域出現時，社會大眾無不投以極大的關注。迨至二、三〇年代因這類新女性已越來越多，她們的活動不再成為焦點，但從事表演或競賽的新女性始終逃脫不了大眾的矚目，其中女演員、女運動員，如同櫥窗中的展示品呈現在公眾眼中，接受各界的品頭論足，活躍於球場的女球員便是深受注意的新女性，同時她們的風采比男球員更受到矚目。對女球員感興趣的除一般大眾之外，還包括記者、體育專家和學生等，他們抱持好奇、鼓勵、讚美、嫉妒、批評等各式心情觀看女球員，這些觀察不是由他們本人便是由其他人訴諸成文字，賦予不同的意義。

由於社會大眾不但關心女球員在球場上的球技和容貌儀態，並對女球員的現實生活充滿好奇，也觀照與女球員相關的事物，因此對女球員的形塑是多方面的。球員的重要活動是在賽球，被討論較多的是球員的球技以及與

球賽有關的問題，從〈附錄一〉以及〈附錄二〉中可以看出，觀眾眼中筆下的女球員個個仿如戰場上的驍將，「勇敢善戰」、「神出鬼沒」、「百發百中」、「勇於攻守」、「矯若游龍」、「萬夫莫敵」是他們最常用的字詞。無疑的，在他們眼中有不少女球員的身手無異於男性，甚至超越常人。例如復旦有「三將軍」：何萼梅、金靜虛、陳鼎如，東吳有「四大金剛」：俞楨、狄潤君、施惠愛、薛正；愛國女學有「飛將軍」：劉孟慈。¹⁷⁵至於暨南劉瑪俐、兩江陳榮明、勞大王昌信、國華顧菊林的球技則是不下男子。¹⁷⁶

此外，觀者也以極傳神的方式描述球員的技術，復旦女籃隊長陳淑賢的球藝曾被形容為：

攻守兼能，任前鋒與「鋼鑽」無異，針針見血，記記成功；任後衛與「鐵柿」相若，弄得敵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全校同學呼之為「雌將軍」。¹⁷⁷

動作矯捷、精於搶球的東南王志新，更是神奇：

每見其玉臂初展，球即如吸鐵石席捲而去，誠有如常山趙子龍在千萬馬中如囊中探物也。¹⁷⁸

有趣的是，這種將球場當戰場並充滿陽剛之氣的球技，即連球員本身也感同深受，浙中女籃隊曾生動的描述該隊的球藝：

每次作戰，我隊員都具有堅決的應戰心，故愈戰愈起勁，有合作美妙的傳球，常以短傳推進，使敵方難以摸捉，在三傳五遞之後，即至敵人腹地，衝鋒陷陣，人到球隨，予觀者以難忘之回憶（案：原作「意」），馬不離鞍，隨來疾射，美妙的動作，時常活現在觀眾

¹⁷⁵ 〈復旦的籃球女明星〉，《申報》，1930年3月16日，增刊，頁7-8；〈東吳大學的四大金剛〉，《申報》，1929年7月11日，增刊，頁3；〈愛國女學體育科畢業生〉，《申報》，1929年7月19日，增刊，頁2。

¹⁷⁶ 〈昨日江大籃球：暨南雙勝復旦〉，《申報》，1933年3月23日，頁16；〈兩江三敗東南〉，《體育評論》期14（1933年1月7日），頁3；〈勞大的女生籃球隊〉，《申報》，1929年6月16日，增刊，頁7；〈國華女生籃球隊〉，《申報》，1929年11月22日，增刊，頁5。

¹⁷⁷ 〈復旦的籃球女明星〉，《申報》，增刊，頁7-8。

¹⁷⁸ 〈籃球名星王志新女士〉，《體育評論》期14（1933年1月7日），頁3。

眼簾之前。¹⁷⁹

振華女中的球員則以交戰和馬戲表演來看待該校女籃與蘇州慧靈女中的一場表演賽。¹⁸⁰顯見無論觀眾或女球員都將球賽帶入戰場，因此球場上的球員各個成為戰士。

除了描繪球員的技術之外，觀者也對女球員的球技進行檢討，凡在與國家榮譽有關的中外球賽中的球技尤受關切。1933年萬國女籃形成中美英鼎足三分的緊張場面時，《體育評論》的記者曾訪問西青女籃健將白特那的父親，請白以外國觀眾的身份針對中華隊球員的優缺點進行分析，白指出陳榮明、王志新的表現最可觀，陳「身手敏捷，確是人才」、王「動作清晰，楚楚有致，皆合乎規矩方法」；至於黃淑華與陳白雪固然勇敢，但犯規太多，特別是一些未被裁判察覺的小動作。¹⁸¹儘管白不是體育專家，記者卻認為白的觀察值得作為球員借鏡。¹⁸²

球賽不能端賴一、兩個球員的技術，必須配合整體演出，因此有的評論不偏重球員個人。1934年國人冀予厚望的男女排球於「遠運」會中雙雙落敗後，檢討球技的聲音此起彼落，出席「遠運」的南京代表劉玉蘭在接受北平《晨報》的專訪時曾表示，中華女排的球藝其實較菲隊勝出一籌，但因體力不如人致而慘敗。¹⁸³排球名教練陳昂德也認為女排球員的個人技術確實高過菲隊，不過和劉不同的是，陳指出女排的失敗是出於球員間不夠合作，

¹⁷⁹ 〈浙江省立高級中學〉，《體育半月刊》期 36-37（1933年5月），頁 63。

¹⁸⁰ 在洪鶴齡的文中可以看到：「一霎那間在空中的只見球往來不絕，上下滾著、忽進忽退，大地上的沙泥混亂地在空中飛揚，兩旁雄壯的吶喊聲振起了雙方的精神。各各準備著，急切而帶著競爭的態度，大家好似猛虎般跳躍不息，有的倒在地上，跌交是不留意的，而起身卻也特別的加快，看來好像在交戰，挺起了兩足好像在做著馬戲，張大了兩眼如狼如虎，後來終被我們戰（案：原作「占」）勝了。」。蘇州市檔案館藏，檔號 J6-1-10，洪鶴齡，〈比球〉，《石珠》（1931年），蘇州振華女子校級刊，頁 17-18。

¹⁸¹ 〈外人目光中之中華女子籃球隊〉，《體育評論》期 22（1933年3月11日），頁 33。

¹⁸² 〈外人目光中之中華女子籃球隊〉，《體育評論》，頁 33。

¹⁸³ 劉指出，菲隊球員個個「雄糾糾的，塊頭高大，體力充足；反觀我國隊員，固然多很結實，可是身材不免短小」；〈我國女選手參加遠運〉，北平《晨報》，1934年6月5日，版 9。

他也強調球員不合作是中華球隊的通病。¹⁸⁴無疑的，這些批評是居於「旁觀者清」的立場，試圖為女球員尋找球技上的盲點，以利女球員進一步的衝刺。

惟儘管大眾對女球員的球技給予高度的期待，甚至將女球員的技術比擬男性或神格化，對於女球員的比球規則、裁判方法或球賽型態卻持不同的看法。就比賽規則言，其中男女籃球的賽規，有性別差異，為不讓女球員的體力無法負荷，女籃規則有較多的限制，1921年以前球場分三區，每隊每區3人，女球員固定在3個區內活動，不得越出分區線；1921年以後改為二區制，每隊每區2人，分別固定在前後半場活動，不得越過中線，這項規定直到1949年才改變。¹⁸⁵但男籃卻不曾有限區活動的規定。另外，自有女子球類運動以來，體育單位即不贊成女球員在正式比賽中使用男子規則，因此不但國人舉辦的女子球賽一直採用女子規則，同時也禁止女球員參加使用男規的國際球賽。¹⁸⁶但隨著國際間使用男規的趨勢日盛以及部分女籃球員在非正式場合運用男規得當，各界對女籃的規則問題不再一致。特別是1934年「西青女籃會」決定改用男子比賽規則時，曾引起論辯，其中溫懷玉和周文娟分別提出較具體的見解，溫認為採男女有別的球規大致有兩項因素：

一則可免裁判上困難，因女子神經自制力較弱，如用男規則攜球跑犯規等，將占全局之半，可謂不勝其煩矣；二則適應女子之體格，因女規活動量小，可免罹心肺各病。¹⁸⁷

溫進一步解釋，美國的籃球歷史悠久，其女性體格遠勝國人，同時，採用男規是經過長期演進，不似國人的女籃活動僅有十餘年歷史，因此國人遽然應用男規妥當與否值得考慮。¹⁸⁸他又指出，女性的體力或機巧度遜於男性，採

¹⁸⁴ 〈遠運男女排球我國失敗原因感想〉，北平《晨報》，1934年6月17日，版9。

¹⁸⁵ 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體育史簡編》，頁56。

¹⁸⁶ 例如1930年「遠運」的女籃賽，我國曾因擬採用男子球規而拒絕參加，迨至主辦單位改用女規，我國始派隊參賽。〈女籃球仍用女規則〉，《申報》，1930年5月3日，頁15。

¹⁸⁷ 溫懷玉，〈對於女子籃球：引用男子規則之芻議〉，上海《時報》，1934年11月13日，版7。

¹⁸⁸ 溫懷玉，〈對於女子籃球：引用男子規則之芻議〉，上海《時報》，版7。

用男規是強其所難；加以女性好勝心強，比賽時常奮不顧身，而男規中爭搶跳躍的動作多過女規，易導致傷膚挫筋，進而裹足不前，視籃球為畏途。¹⁸⁹

無疑的，溫的論調是出於女球員進入男球員球場文化時的憂慮，但這種既關懷女球員卻又質疑女球員能力的看法，受到挑戰，周文娟就溫認為男子比賽較女子比賽激烈的這一點，提出反駁：

蓋考激烈的來由，厥為雙方加迫所造成，互相增力所致果，而其程度高低，以雙方體力為準繩。……女子與女子賽，雖引用男子規則，其激烈程度與引用女子規則無異也，反之，男子賽倘引用女子規則，當其純熟後，其激烈程度仍有提高，而與男子規則無異也。¹⁹⁰

關於女性爭強好勝的說法，周認為是體育教育以外的事，與男規的弊病無關。她也對主張運用男規的理由做了說明：一是女子規則拖泥帶水，造成精彩球技常受制於規則而無從展現；另一是女籃攻守分區，致使球員間的聯絡不能一氣呵成。¹⁹¹同時，周以名聞全國的廈門集美中學女籃為例，指出該隊球員私下練球便多採男規，不僅運用自如，甚至比使用女規更為玲瓏活潑。

¹⁹²

周的觀察很明顯的是根據球規的癥結及運用方式，表抒她贊成採用男規的看法；而不是站在兩性有別的立場檢視女球員在球場上應享有何種對待。不過，這類聲浪並未改變體育單位的決定，正式的女籃比賽仍繼續延用女規，不希望女球員以激烈的方式進行球賽。

其實社會大眾不僅認為在球規上應男女有別，裁判也應反映這種觀念，例如 1933 年大夏的女籃隊赴南京比球時不幸落敗，該校記者對女裁判員楊效讓的判決方式極為不滿，除指責楊身為裁判應具高尚聖潔的心，不可感情用事之外，並建議裁判不能專講理論枉顧實用，他堅持應以較寬容的態度來裁判女球員，因為：

¹⁸⁹ 溫懷玉，〈對於女子籃球：引用男子規則之芻議〉，上海《時報》，版 7。

¹⁹⁰ 周文娟，〈女子籃球應運用男子規則議〉，上海《時報》，1934 年 11 月 30 日，版 7。

¹⁹¹ 周文娟，〈女子籃球應運用男子規則議〉，上海《時報》，版 7。

¹⁹² 周文娟，〈女子籃球應運用男子規則議〉，上海《時報》，版 7。

女子身體較弱，一舉一動，時常不克自制，裁判員應隨機應變，加以原諒，苟非出諸故意，不應隨便處罰。¹⁹³

至於男女能否共賽的問題更受各界矚目。有論者認為，為誘導青年運動應倡導男女共同運動，署名「亭」的青年學子就個人的觀察指出，一般青年都想接近異性，倘若實行男女共同運動，為博得異性讚賞的一方自然會努力發展運動技能，技能一旦增長，運動興趣遂趨濃厚。¹⁹⁴「亭」發現他所就讀學校的某班同學每逢十分鐘下課時間必往操場打「隊球」（案：「隊球」即排球），為的是有女同學參與其間。¹⁹⁵事實上，有不少球賽是採男女共賽的方式，除正式的網球賽之外，在籃、排球友誼賽中，經常出現男女共賽，遠征東南亞的女子籃球隊也曾與當地的男子隊進行對抗。

這些活動雖非正式演出，卻引起各界重視，其中籃球的男女共賽曾因怪狀百出，致遭非議。¹⁹⁶例如 1930 年 8 月《大公報》的〈諍體育界〉短評針對上海先後舉辦男女共泳及男女對比籃球而帶來轟動的新聞指出，籃球是一種劇烈運動，活動範圍又小，球員間衝突的機會甚多，稍一不慎便滑倒或跌在一處，容易造成觀眾與運動員的起鬨。¹⁹⁷為此該文作者向體育界進言「慎徒炫新奇，以斲喪青年學子之意志，並傳播壞影響於一般社會」。¹⁹⁸「體協會」旋即公告，凡於中華籃球房舉行男女比賽概行謝絕，其理由是：

男女體格之構造強弱迥異，對於接觸劇烈之籃球比賽，勢無對敵之可能，既非女子生理上所許，更不符體育提倡之本意。¹⁹⁹

由於男女共賽並未違法，在非正式的球賽中仍可看到男女共賽。1932 年北平受上海影響曾出現這類比賽，署名「斯艾」（又作「艾斯」）的作者遂以〈一幕兩性肉搏記〉為文題，描繪男女混合籃賽的尷尬場面。由於在這

¹⁹³ 王澤民，〈錦標前後〉，《大夏》卷 9 期 24（1933 年 5 月 1 日），頁 495-496。

¹⁹⁴ 亭，〈誘導青年運動的我見〉，天津《大公報》，1928 年 5 月 11 日，版 9。

¹⁹⁵ 亭，〈誘導青年運動的我見〉，天津《大公報》，版 9。

¹⁹⁶ 〈過猶不及〉，天津《大公報》，1930 年 8 月 16 日，版 4。

¹⁹⁷ 〈短評：諍體育界〉，天津《大公報》，1930 年 8 月 17 日，版 4。

¹⁹⁸ 〈短評：諍體育界〉，天津《大公報》，版 4。

¹⁹⁹ 〈籃球：男女賽不合理〉，《申報》，1930 年 8 月 26 日，頁 12。

場比賽中男球員如同餓虎撲羊，而觀眾又極盡消遣之能事，因此「斯艾」從生理、規則與事實三方面批駁男女混合籃賽的弊病，他認為籃賽是相當激烈的運動，加以男女的生理和體格不同、強弱不均，合賽時不但有害女性生理，也使男性不能切實發展球技；另外，男女球規原本不同，混合比賽不宜僅用一種。再者，男女相互肉搏作戰，除不合體統之外，易出現輕薄或卑鄙行為，「斯艾」指出姑不論這種動作是否出於有意，卻會連累自愛的球員。²⁰⁰此外，前述「浙省建設運動會」之後的一場男女會外賽也引起非議，儘管這場比賽是餘興表演，在二十分鐘的比賽中廳長率領的男隊既未進一球，又延誤選手的公宴時間，因此引起與會者不滿，有記者更諷刺這場比賽不在比試球藝而是借此作樂。²⁰¹

嚴格而言，男女共賽有單純的一面，在共賽的過程中，因參賽者不是彼此相識便是同輩，誠有助女球員球藝的增長；惟一旦有社會人士介入或涉及兩性有別的看法時，共賽方式便被複雜化，再加以比球時不乏調戲女球員的心態或動作，致使親睹這些場面的論者憤忿不平，為聲援女球員並端正球場風氣，遂口誅筆伐以反對男女共賽。

事實上，大眾對女球員的關心不僅止前述；女球員呈現在大眾面前的容貌姿儀，因讓大眾得以一覽無遺，有的觀者還從環肥燕瘦等不同角度予以刻畫。²⁰²其中身材壯碩的女球員多半被視為男性，例如觀者稱崇德的陳新元「氣力砍大，有如男子」，兩江名將陳榮明是一位「全無女子氣」的球員。²⁰³而球員中確實有喜扮男相者，從陳榮明、陳聚才在《女運動員》一書中的

²⁰⁰ 斯艾，〈一幕兩性肉搏記：對於男女混合籃球之商榷〉，北平《晨報》，1932年1月22日，版9；艾斯，〈一幕兩性肉搏記：對於男女混合籃球之商榷〉，北平《晨報》，1932年1月24日，版9。

²⁰¹ 〈所謂浙省建設運動會（案：原記「動運會」）者〉，《體育評論》期14（1933年1月7日），頁1。

²⁰² 例如「健全的身體、肥壯的玉臂」、「身材高人一等」、「高大」、「身材魁偉」、「體態龐然、氣力很大」、「身材高大似男子」、「身體偉肥」、「矮碩」、「瘦小靈活」、「嬌小玲瓏」、「秀氣斯文」、「短小精悍」等，以上參見〈附錄一〉、〈附錄二〉。

²⁰³ 〈女子籃球賽昨日結束〉，《申報》（1929年12月18日），頁11；另見〈附錄二〉。

寫真即見一斑，二陳無論髮型、衣服款式均仿自男性。²⁰⁴兩江的席均則喜著長褲、戴翻邊白帽上場打球，觀者認為那種雄糾糾、氣昂昂的姿態無異於男性。²⁰⁵此外，身材魁梧的陳金釵在出席全運會時，曾妝扮成美少年，令人雌雄莫辨，鬧出被排拒於女球員宿舍外的趣聞。²⁰⁶

至於面貌娟秀的女球員不僅是記者筆下、更是記者照相機上的寵兒，家喻戶曉的關柳珠、陶蕙、孫毓秀便是衆人心目中的球場佳麗。²⁰⁷這群球員除了在球場上帶給大眾驚艷之外，有的還是校園中的「校花」，並為男士爭相追逐。例如「三將軍」中的陳鼎如擁有「校花」和「皇后」雙重雅號，她的美麗與活潑吸引不少仰慕者，因此當陳與該校同學結婚時，記者以詼諧的口吻勸戒有心人士不要為此寢食不安。²⁰⁸此外，球員的性格也盡入觀眾的眼中筆下，一般人對女球員的粗淺印象是天真活潑，不過，有觀眾給予較深入的觀察，譬如民立的黃杏芬「性情豪爽、舉止大方，有名將之風」、兩江的劉守光「舉止溫文、玉立亭亭、宛似閨秀女郎」、東吳的狄潤君「為人和藹可親、笑容可掬」；²⁰⁹而王志新在形勢險惡的球戰中能保持微笑，不露慌張之色的鎮靜工夫，更讓大眾印象深刻。²¹⁰至於球員的情緒和習性，大眾也有入微的觀察，最常見的是，描述失意球員在球場上痛哭流涕的一幕。²¹¹另如

²⁰⁴ 其二人梳男式短髮，著西裝、繫領帶，參見裴順元、沈鎮潮編，《女運動員》，（上海：上海體育書報社，1935年），無頁碼。

²⁰⁵ 〈球經（續）〉，上海《時報》，1935年2月24日，版7。

²⁰⁶ 〈東亞巾幗列傳〉，上海《時報》，1936年3月14日，版7。

²⁰⁷ 關被讀為「貌尤娟麗」、而陶是「面貌秀麗」、孫「面目嬌秀」；其他如滬江大學的邱麗雯「美麗丰姿、溫文性格」、上海中學的楊品珍「艷麗動人」、勞動大學的邱富敏「美麗的臉龐，窈窕俏麗的身材」，以上參見〈附錄一〉、〈附錄二〉。

²⁰⁸ 記者稱陳鼎如有似「芙蓉的顏，像牡丹的貌，與那窈窕的身材和活潑的態度」。〈復旦的籃球女明星〉，《申報》，增刊，頁7-8；〈復旦的三女運動家〉，《申報》，1929年11月4日，增刊，頁6。

²⁰⁹ 參見〈附錄一〉、〈附錄二〉。

²¹⁰ 〈籃球名星王志新女士〉，《體育評論》，頁3；《女運動員》，無頁碼。

²¹¹ 《申報》和天津《大公報》即曾刊載1930年「全運」與1934年「遠運」中球員挫敗後的悲傷場面；而曾適敦也指出女運動員因球賽失敗而痛哭的新聞常見於報紙。〈女子籃球決賽〉，天津《大公報》，1930年4月17日，版5；〈女子排球公開表演〉，《申報》，1934年5月14日，頁15；曾適敦，《女學生生活素描》，頁45。

東吳吳劍郡比賽時不戴眼鏡、勞大張素華打球時手繫紅帕都深印觀眾腦中。

212

然而大眾對女球員的觀察不完全是正面的，體育界的異常現象、女球員本身的行為以及觀者的心態，導致另類聲音的浮現。不少人認為受錦標主義的影響，三〇年代的體育活動陷入畸形發展，何文信在〈我對於全國運動會的觀察〉一文指出：

學校養運動選手做招牌，一般人對女運動員特別注意，競爭錦標所起的鬥毆糾紛，運動選手養成不讀書的習慣等等現象的發生，更可見運動已成為病態的、寡頭的、職業化、商品化了。²¹³

何的論述點出女球員受到過度的注意是一種病態現象，此從男女籃球共賽中觀眾的故意起鬨已略見端倪。有趣的是，有的男性觀眾對這種現象百思不解，運動會場外便曾傳著這樣的話語：

「為什麼娘兒們幹事，總叫人興奮？其間究竟含著什麼哲理？」

不知那位朋友在人叢中說的，可是這答案誰也沒有本領應承下來。

「乖乖！姑娘們真好福氣！有這許多人花（案：原作「化」）了本錢來替她們拍照！」

這是校裡的汽車夫阿三說的；聽的人都笑了。²¹⁴

儘管可能沒有答案或答案十分分歧，許欽文的說法顯然對這種現象提供部分解答：

在禁慾主義的舊禮教的環境中生長的男孩子，多少總有點色情狂，看了這樣的「女學生」，難免骨頭髮鬆，魂不附體了。²¹⁵

許所謂的「女學生」便是「有著兩條粗壯的腿，會拍網球、打排球，

²¹² 〈評東吳大學女生籃球隊的球藝〉，《申報》，1929年7月27日，增刊，頁3；〈勞大的女生籃球隊〉，《申報》，增刊，頁7。

²¹³ 何又認為運動健將集中於都市，不能普及於內地也是運動畸形發展的一項因素。何文信，〈我對於全國運動會的觀察〉，《申報》，1933年10月22日，增刊，頁1。

²¹⁴ 祥鼎，〈運動會〉，《申報》，1934年5月29日，頁1-2。

²¹⁵ 許欽文，〈論女學生〉，《申報》，1933年9月26日，頁17。

還會在水中游來游去，會高聳小嘴巴唱歌，又會驅動旗袍跳舞」。²¹⁶

足見觀眾對女球員的好奇是出自對女球員身體窺視的興趣。然而有部分女球員的表現確實帶來不安，甚至不滿，而有這種反映的不僅是男性，也包括女性。從外表言，女球員在球場上的過度妝扮便讓有些觀眾匪夷所思，前述的「寥星」質疑道：

她們似乎覺得虛榮比較實際問題更為重要，而每於比賽場上都要大出風頭一輪，裝扮得妖精似的，只要博得人們的下一注意。……她們簡直忘記了提倡體育為的是什麼。²¹⁷

「拾遺」則將女運動員的傅粉施朱諷刺為在開服裝比賽會或賽美會，她舉例指出這類裝束曾遭強烈反彈：

記得去年秋季在某校有一場排球比賽，其中某隊的一位隊員，穿著白色的衣褲，上面綴著各色奇怪的人頭，頭髮是弄成一個小勾在額上。因為這種修飾引來多少人的惡意的批評，甚至牽涉到私人的道德問題。²¹⁸

「拾遺」因此建議運動衣要求輕便適體，運動員要注意「清潔便是美」，不要崇尚矛盾的裝飾而造成自己人格的低落。²¹⁹

從態度言，有人認為男性運動員一旦成名便易因驕傲、濫捧、生活不規則或不求進步而自毀前程。²²⁰例如「拾遺」發現最普遍的現象是開運動會時不守時，練習時又不到場，處處表示自己與眾不同；不過，她強調這種情形在女運動員中尤其常見。²²¹陳碧雲則將女運動員與電影明星相提並論，指責她們惑於虛榮的引誘，專門以雕蟲小技博得吹捧，甚至為提高地位，接受惡勢力的捧場，並聽憑對方驅遣。陳進一步嚴斥，以被人玩弄為得意的女運

²¹⁶ 許欽文，〈論女學生〉，《申報》，頁 17。

²¹⁷ 寥星，〈為的什麼呢？〉，《女青年月刊》，頁 34。

²¹⁸ 拾遺，〈今日女運動員的病態〉，《國民體育匯刊》，頁 32。

²¹⁹ 拾遺，〈今日女運動員的病態〉，《國民體育匯刊》，頁 32。

²²⁰ 汪桂芳，〈勗全運會女選手〉，《婦女月報》卷 1 期 10（1935 年 4 月 10 日），頁 2-3。

²²¹ 拾遺，〈今日女運動員的病態〉，《國民體育匯刊》，頁 32。

動員是「想準備作姨太太，以求顯達而已，這是如何可悲的一種墮落傾向啊！」²²²另外，「秋英」從一場女學生賽球時輕狂、笑鬧的賽況指出，賽球應抱持嚴肅的態度沈著應戰，在嚴肅的場合中撒嬌只能作賤自身的人格，只有增加和證明「女性是男子玩物」的事實；「秋英」更藉女球員的例子，提醒女性不要因給予男子一時的滿足，失掉女性尊嚴，成爲男性談話的資料或笑柄。²²³

女球員輕慢的態度不僅表現在球場也呈現於課堂，前述何文信即提到畸形運動風氣造成選手不讀書，當然女球員中不乏勤學用功者，但也有輕忽學業、藐視師長的女球員，在曾迺敦筆下即出現惡行惡狀的一幕：

運動員一上課，書本擺在棹面上，卻從抽屜裡摸出「良友」或是「文華」書報，悄悄地翻、翻、翻完了，翻到疲倦了。她說：「 χ 先生時間快到了，早一點下課吧！下一課我們要練習排球呢！」教員繼續講，學生不睡著，便是竊竊私語，不是罵教員，便是講她的球經。²²⁴曾也發現，面對趾高氣昂的女球員，女同學的心情是相當複雜，有的投以欣羨、崇拜、熱情的眼光，有的則以嫉妒、鄙夷和冷淡看待。²²⁵

值得注意的是，大眾對女球員的關注不僅是曾在球場叱吒風雲的那段時光，因此儘管球員的生涯相當短暫，令觀眾印象深刻的球員很難遽然消逝。爲使大眾瞭解她們的動向，記者如影隨形的跟蹤她們，讓她們再現於大眾眼前，從球員的出路、感情世界再至婚姻生活無所不包，如〈附錄一〉和〈附錄二〉所載。其中婚變的新聞更被大肆炒作，1934年4月《體育評論》曾以〈女籃球健將婚變記〉的醒目標題刊載邵錦英的情史，由於邵原與畢業復旦的高兆烈訂婚，兩人形影不離，是眾人眼中的天成佳偶；詎料情海生變，邵另與之江大學體育主任劉雪松訂婚，因此震驚各界，也令部分人迷惑。²²⁶

²²² 陳碧雲，〈兩年來的中國婦女〉，《女聲半月刊》卷3期1（1934年10月），頁7。

²²³ 秋英，〈有感於某校女生賽球〉，《世界日報》，1935年4月22日，版6。

²²⁴ 曾迺敦，〈女學生生活素描〉，頁10。

²²⁵ 曾迺敦，〈女學生生活素描〉，頁46。

²²⁶ 〈女籃球健將婚變記〉，《體育評論》期81（1934年4月21日），頁271。

《體育評論》即轉引刊於《北洋畫報》的註語慨歎：

……情場變幻，竟有如是莫測，亦可謂駭人聽聞矣，劉邵之愛情，成熟之速，亦非有特列快車所能及之嘆，古人云，朝秦暮楚，令人不寒而慄，噫！²²⁷

六、結論

近代女球員是在球類運動的興起下產生，其成員主要來自學校。其中籃、排球運動發展較早，且是多數學校的重點運動，因此投入這兩項運動的女球員人數遠多過其他球員。二、三〇年代的華東是全國體育活動最耀眼的地區，女子籃、排球的精英球員也多集中於此，這群女球員的重要性誠可想見。這段時期女子體育是國民政府積極推動的一項體育事業，又適逢女子籃、排球賽的陸續展開。校園中一時湧現組織球隊的熱潮，並增添了這群新貴。

組織球隊固然是一種時尚，成立的過程卻相當艱辛。受整個大環境的影響，此期女球員經常面臨無人指導、經費短絀、場地不足、球員人才難求等問題，再加上球隊壽命有限和戰爭的干擾都讓球隊無法順利成軍。儘管如此，各校的女子球隊仍接踵產生，其中球技出色的球員或球隊有機會出席全國或國際性的球賽，這類球隊是由體育單位負責培訓，其發展過程與校隊顯著不同。女球員參加的球賽有正式與非正式兩種，聲名遠播的女球隊更是頻繁演出，賽球的對象與地點相當廣泛，無疑的，球賽讓女球員得以展現球技進而在這方面有所精進，球賽也同時改變了女球員的角色地位，使女球員有別於其他女學生或同時代的女性，且增加與男性互動的機會，甚至成為社會大眾矚目的焦點。

與一般女學生或傳統女性比較，女球員呈現三種特性：一是女球員是憑藉球技嶄露頭角，而非品德或知識；易言之，在四育兼備的教育目標下，女球員具備的是運動技能和健康美。此外，為養成或展現球技，女球員必須

²²⁷ 〈女籃球健將婚變記〉，《體育評論》，頁 271。



在大庭廣衆下活動，並凸顯自我；二是女球員不是代表學校便是地方或國家參加比賽，爲爭取錦標，她們的責任深重；三是此一時期賽球方式、球場術語或球規都傳自西方，加以女球員的賽球對象包括西人，因此女球員受到西化的機會大於其他女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特性讓女球員努力表現，同時影響她們的處世態度和日常生活。

首先，參與球賽必須有精湛的球技和充沛的體力，女球員投身球場後即以繼夜不斷的練習，勤奮不懈的精神令男球員望塵莫及。她們也試圖超越性別藩籬，請精通此道的男同學充任指導，並與他們一同練球；甚至出戰男子球隊，透過男女共賽以增強實力。儘管男女共賽僅出現在非正式的場合，且未設置分數名次，女球員又經常落於敗陣，但她們不惜一戰。另外，爲保障權益，女球員曾在球場使用權與裁判公平與否等方面據理以爭、挑戰權威。此處固然無法論斷這是否是女權思潮蓬勃所致，惟毋可否認的，女球員的毅力與堅持以及大環境的因勢利導，使原是球場邊緣的女性得以進入核心。

其次，賽球讓女球員嶄露頭角的機會大增，卻也令她們疲於奔命，飽受身心折磨，經常遠征異域的球員即嘗盡個中滋味，錦標殊榮顯然是維繫她們精神不墜的要素，蓋錦標既可以彰顯個人，又能榮耀學校、地方乃至國家，因此女球員立志奪標。惟這種雄心壯志，不免存有虛榮的心態，例如兩江隊遠征歐美計畫的受阻便被指爲是出於虛榮。此外，學校與社會大眾對女球員的禮遇也是讓女球員樂於表現，面對觀衆的蜂湧圍觀、啦啦隊的鼓譟助陣、學校師生的熱切期待以及社會大眾的風靡崇拜，任何人都會爲此動容，遑論這群有心成名的女球員。故處在既實又虛的光環下，女球員之所以努力不懈是可以理解的；而這股力量甚至讓女球員對球員生涯充滿依戀，不願輕易退出。

其三，女球員對來自西方的球類運動不是僅被動的吸收，也主動、積極的運用或回應。從「西青女籃賽」中時見中華女球隊與西僑球隊交戰的精采局面，甚至以挫敗西僑來表現民族精神。重要的是，女球員除從中學到球技之外，同時也經由球賽進一步接觸到西洋文化，出征國外賽球的女球員更

有機會看到新奇的西洋事物；此外，有的球員還將這些文化帶入日常生活中，例如在談話或書寫中夾帶英語，這在會講洋文是象徵摩登的時代，女球員顯然因球賽而登入摩登的行列。然而女球員不但接收西洋文化，且借學得的英語及個人交際能力向西洋人宣揚中華文化。這種來自賽球的意外收獲是一般女學生不易有的體驗。

其四，做為社會新群體的女球員，她們的角色是多樣的。撇開學生的身份不論，女球員的運動員角色，使她們成為推動女子體育的動力，並得為所代表的團體或組織爭光。此外，由於女球員的角色是不能畏縮，必須外顯自己、宣傳自己，例如透過公開表演、媒體報導向眾人展示球技，並經常進出社交圈，因此女球員又有如電影明星或社會名媛這一類新女性。²²⁸至於女球員本身所呈現形象也相當不一，有的女球員顯現英雌氣概，更有女球員以男子自許，予人雌雄莫辨、非男非女的模糊印象；但有女球員講究外表，藉由妝扮或流行的髮型、服裝緊扣觀眾；或有以出眾的才能，獲得明星或皇后的「美名」，成為觀眾的偶像。另有女球員則狂傲不羈，不專心求學、流連社交場所。女球員的不同形象固然反映的是球員個人的性格或喜好，事實上，也是二、三〇年代都市新女性的形象，由於這些形象代表摩登、時髦，因此女球員成為摩登的化身，也是摩登的傳遞者。

由上述可以看出，女球員的產生顛覆了傳統女性既有的角色。而女球員的產生也撼動男球員獨占的地位，對男女兩性不啻是一大衝擊，由於球員來自校園，受到衝擊的主要是學生。男球員的反應呈現兩極化，有的球員樂於和女球員和平共處，或充任女球員的指導或與女球員一同練球；有的球員則持針鋒相對的姿態向明星女球隊宣戰、與女球員爭奪球場。從這兩種反應可以看出，男球員不甘示弱、操弄霸權的心態，但在這種強者支配弱者的態勢之外，又呈現男女平權和男性眷顧女性的一面。嚴格而言，由於在正式球賽中，男女球員是分開比賽，任何一方都不會影響對方的勝者地位，因此這

²²⁸ 陶希聖指出三〇年代的新式女子「決不能留在閨閣來待字。她不是羞縮的。她是自己運動的。她必須出現於交際場，她必須暴露，宣傳自己，和表現自己。」參見陶希聖，《中國社會現象拾零》，頁 337。

種衝突僅是一時而非長期。至於女球員之間因資料不足，僅看到相攜練球或敗者傷心落淚的場面，而未見彼此衝突。對非球員的男女學生而言，女球員帶給他們不小的影響，一則激起他們打球的興趣，另則組織啦啦隊為女球員助陣，甚至有男同學迷戀女球員。不過並非所有的學生都認同女球員，也有學生對女球員充滿嫉妒和鄙視，其中不乏女同學。總之，女球員在兩性間引發緊張、衝突乃至矛盾，也在兩性間建立起和諧、互助的關係。

女球員進入球場核心，便引起觀眾的矚目，雖然與男球員具有同樣的身份地位，但她們是球場上的新貴又是令觀眾好奇的新女性，受到的注意遠勝過男球員，這其中有關懷也有不安和不滿。較受注意的是女球員的球技，觀者分從各種角度觀看她們的球技，並提出批評與建議。另外，球賽方式也備受重視，基本上，大眾多半以去性別化的態度要求女球員，在規範上，男女球員所受的約束無所軒輊；在球賽中，女球員得到的助陣無異於男球員；而明星女球員還需為國爭光。至於觀眾對球場上女球員的印象也是充滿陽剛之氣，視之為戰場上的驍將。

儘管如此，女球員的女性角色仍是存在並被強調，女球員只能運用女子規則賽球，即使有觀者就女子球規的癥結倡議改採男規，基於女性體力不及男性，部份觀者與體育單位堅持使用兩性有別的球規；這種寬待女性球員的論調同樣出現在裁判判決上。其實，在非正式球賽中女球員採男規比賽或與男性比球是被默許的，並有助於女球員球技的提昇；然而部分觀者發現，男女共賽有戲弄女球員的意圖，遂大力反對。顯然性別是女球員無法比同或超越男球員的障礙，不過，性別似乎也是女球員得到包容的護身符。惟這是否說明女球員仍未擺脫弱勢的處境是值得深思的。

除上述之外，球員的容貌風采、情緒習性因盡入觀眾眼簾，故也是大眾觀看的焦點，擅長交際或不讀書的女球員受到強烈指責，喜作時髦打扮的女球員一樣遭致指責，顯而可見的，受制於球員的角色地位，女球員成為摩登女性是容易卻又困難。無論如何，這類觀者是以正當而關懷的態度臧否女球員，但另有男性觀者僅著眼於女球員的容貌和身體，致而態度曖昧、輕狂。由於大眾不僅重視球場上的女球員，對明星女球員退出球場後的動向同樣留

意，媒體尤其不錯失對她們的報導，這固然能使女球員的形象永烙人心，女球員卻要具備不畏人言及能勝其擾的風度，而這種現象顯然是公眾女性的共同問題。

綜括而言，1927-1937年間在華東地區舉辦的球賽彰顯了這個地區女球員的角色地位，與一般女性不同的是，女球員是憑藉個人球藝受到各界矚目，甚至成為校園及社會的崇拜和模仿對象。由於女球員處在女權思潮蓬勃、自主解放意識高漲和都市新女性當道的時代，她們能超越性別界限，與異性分享和共爭球場；同時有機會藉球員的角色反映社會時尚。儘管在大眾眼中女球員的表現毀譽參半，不過，她們的確是這個時代重要的社會新群體，她們也確曾在人為塑造和時尚所趨下獨領風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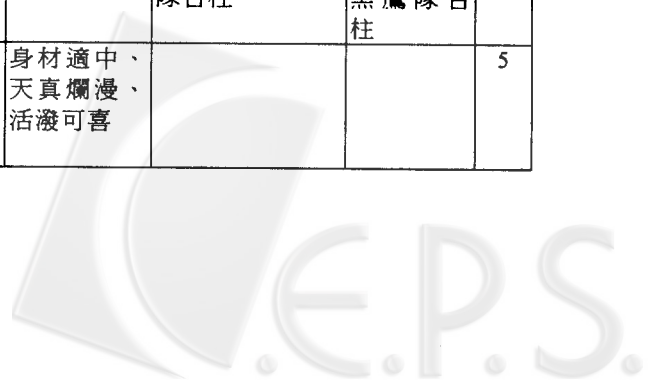
附錄一：全國女子籃、排球名將錄

姓名	籍貫	曾就讀學校	擅長運動	記者眼中的球技	記者眼中的風采	經歷	畢業後動向	資料來源
關柳珠	廣東	民立女中	排球	中排；擅長扣殺、攻守咸佳	貌尤娟麗	代表上海出席全運，也曾代表國家出席遠運		1、2
劉瑪琍	廣東	暨南大學	籃球、排球、游泳			代表國家出席遠運籃、排球賽，江大運動會游泳冠軍		1
潘月英		東南女體專	籃球、壘球	射籃之準，隨心所欲；壘球比賽個中良手		出席上海全市運動會、上海萬國運動會及全運籃球員		1、2
張璧如			排球	精前排、善攔網		出席第10屆遠運		1
黃杏芬		民立女中	排球	中排；能殺能救、尤擅壓球	性情豪爽舉止大方有名將之風	代表上海出席全運；遠運台柱		1、2
陳白雪		兩江女體專	籃球	屢建奇功		代表上海出席全運、萬國運動會		1
陳榮明	四川	兩江女體專	籃球、田徑、標槍		全無女子氣、身體健壯	代表上海出席萬國運動會籃球賽，第6屆全運上海女籃隊隊長，代表兩江至菲島		1、2

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1927-1937）：以報刊雜誌為主的討論

姓名	籍貫	曾就讀學校	擅長運動	記者眼中的球技	記者眼中的風采	經歷	畢業後動向	資料來源
向大威	湖南	兩江女體專	籃球			曾代表校隊至日本	湖南省立第二中學校體育教師	1
鄒善德	蘇州	東南女體專	籃球、跳高			代表上海出席第5屆全運女子跳高第一；代表上海出席萬國籃球賽	服務大夏大學、江西省立體育場；已婚	1
楊森		兩江女體專	籃球			籃球隊長；代表上海出席第5屆全運及萬國運動會	籃球隊長、代表滬出席第5屆全運及萬國運動會籃球賽	1
邵錦英	廈門	兩江女體專	籃球	前鋒；所向無敵		代表兩江至日本	嫁體育家劉雪松；任教廣東省立體專	1
陳聚才	廈門	兩江女體專	籃球	前鋒；技藝精進，鎮靜不亂		代表上海出席全運		1、2
石瑞霞		兩江女體專	籃球	技術經驗宏富		代表上海出席萬國籃球賽、全市運動會及全運		1
楊仁	湖南	兩江女體專	籃球、網球、田徑			隨籃球校隊出征日本、曾獲20年度全滬網球女子單打冠軍、出席全運得女壘擲遠第一		2
郭小萍		東南女體專	籃球	中鋒			婚後再復出；在黑鷹隊任後衛	2
席均		兩江女體專	籃球	中鋒			任教北平翊教女中	2
萬蓉		兩江女體專	籃球	中鋒		曾隨兩江赴日	任教務本女校	1
秦志學		東南女體專	籃球			第一屆女籃會強東隊老將	執教萬竹小學校	2
廖祝元		東南女體專	籃球	中鋒			服務黑鷹隊	2

姓名	籍貫	曾就讀學校	擅長運動	記者眼中的球技	記者眼中的風采	經歷	畢業後動向	資料來源
蔣懷宣		東南女體專	籃球	後衛；與王志新有異曲同工之妙				2
蕭傑英		務本女中	排球、短跑			排球錦標隊選手；代表上海出席第5屆全運		2
陶純		民立女中、交通大學（未畢業）	排球		面貌秀麗	創海星女子排球隊；出席遠運排球賽	嫁足球健將陳虞添	2、3
蘇祖琦		民立女中	排球				惠靈中學校長；嫁上海名律師鄒玉	2
郭彩芬		民立女中	排球					
王志新		東南女體專	籃球	後衛；搶球百不失一，如龍捲球	笑臉常開；不慌不忙		婚後不復出	2
孫毓秀		東南女體專	籃球	中鋒	面目嬌秀		執教宣化	2
梁麗芳		培成女中	籃球				周旋交際場	2
章哲君		東南女體專	籃球		嬌小玲瓏			
李遂銀		崇德女中；東南女體專	籃球	與秦志學齊名			崇德主將	2
郭彩芳		民立女中	排球					
朱民寶		民立女中；培成女中	排球、籃球	中鋒		代表上海參加第9屆遠運排球賽	1937年去世	2、4
陳英瑞		培成女中；金陵女大	籃球		威風凜凜	成立海星女子籃球隊，今為黑鷹隊台柱	成立海星女籃，復為黑鷹隊台柱	2
焦玉蓮	河南	兩江	籃球、排球、短跑、跳遠	右鋒	身材適中、天真爛漫、活潑可喜			5



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1927-1937）：以報刊雜誌為主的討論

姓名	籍貫	曾就讀學校	擅長運動	記者眼中的球技	記者眼中的風采	經歷	畢業後動向	資料來源
劉守光	廣東	兩江女體專	籃球	左鋒；傳幫迅速，尤長投籃	身材細長、舉止溫文、玉立亭亭、宛似閩秀女郎			5
陳榮棠	福建	兩江女體專	籃球、排球、鐵餅、鐵球	中鋒	面目微顰、富健康美、活潑好動			5
陳婉卿	福建	兩江女體專	籃球	左衛；動作靈巧、奔馳迅速、搶幫穩練、臨陣賣力、	短小精悍	代表上海出席全運籃球賽		5
陳金釵	福建	兩江女體專	籃、排球	中衛	身材魁梧、性情亢爽	代表上海出席全運籃球賽		5
許沅		兩江女體專	籃球、標槍	右衛；看守敵人；對手難越雷池，搶幫傳進、亦具功夫		代表上海出席全運籃球賽		5
備註： 1.勤奮書局編譯所，《全國女運動員名將錄》（上海：勤奮書局，1936.6）； 2.裴順元、沈鎮潮編，《女運動員》（上海：1935年4月，上海體育書報社）； 3.〈陶純小姐已離交大〉，《申報》，1929年6月13日，增刊，頁5； 4.〈凋謝了凋謝了：朱民寶與湯姆遜〉，上海《時報》，1937年3月13日，版7； 5.〈東亞巾幗別傳〉，上海《時報》，1936年3月14日，版7。								

附錄二：1929年江蘇地區校園女子籃、排球名將錄

姓名	籍貫	就讀學校	擅長運動	記者眼中的球技	其他才能	記者眼中的風采	經歷及畢業後動向	資料來源
沈文英	無錫	東南女體專	籃球、長跑	中鋒；勇敢善戰，出沒全場，令人莫測，投籃準確，姿勢優美	歌舞、網球		強東隊健將、1929年受聘至安徽第五中學女子部	1
孫仿倫		東南女體專	籃球		田徑、鉛球、跳遠、擲鐵餅	嬌小玲瓏、天真爛漫	1929年擲鐵餅冠軍	4
秦浩然		東南女體專	籃球		網球	身體魁梧	強東籃球隊主將；曾為東南體專任舞	4

姓名	籍貫	就讀學校	擅長運動	記者眼中的球技	其他才能	記者眼中的風采	經歷及畢業後動向	資料來源
							蹈教師，現任教上海某校	
陳鼎如		復旦大學	籃球	前鋒		似芙蓉的顏，牡丹的貌、復旦的「校花」		2
陳淑賢		復旦大學	籃球	攻守兼能			曾任籃球隊長	2
何萼梅		復旦大學	籃球	前鋒				2
劉慕賢		崇德女校	籃球	避後衛阻攔、神出鬼沒	網球			3
陳祝遐		崇德女校	籃球			身體健全、玉擊（案：應是「臂」）肥壯		3
梁慈如		崇德女校	籃球	前鋒；投籃準確			1929年8月去世	3
黃佩琅		崇德女校	籃球	守衛；投籃準確				3
楊榮基		崇德女校	籃球	守衛；投籃準確				3
吳劍郡		東吳大學	籃球	中鋒；勇敢、擅奪球				5
周芬		東吳大學	籃球	擅救球	演說	高大、態度鎮定		5
俞楨		中西女塾、東吳大學	籃球	中鋒；勇於攻守		身材高大		5、6
狄潤君		務本女校、東吳大學	籃球	前鋒；善投擲	書法、網球	為人和藹可親、笑容可掬；氣力過人		5、6
薛正		聖瑪利女校、東吳大學	球類				曾任上海女青年幹事；籃球隊長	6
石水英	南洋華僑	愛國女學	球類	勇敢準確	音樂、拳術、舞蹈			7
劉孟慈	湖北	愛國女學	球類		舞蹈	口才佳	曾著武裝，度軍營生活	7
劉英舜	廣東	智仁勇女學	球類		音樂、舞蹈劇	身材高人一等		8
邱麗雯		湖郡女學、滬江大學	籃球	前鋒；擲籃十有九中		美麗風姿、溫文性情		9
誠恩慈		滬江大	籃球	前鋒；傳遞擲		瘦小靈活		9

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1927-1937）：以報刊雜誌為主的討論

姓名	籍貫	就讀學校	擅長運動	記者眼中的球技	其他才能	記者眼中的風采	經歷及畢業後動向	資料來源
		學		籃均出色				
鄺文偉		中西女學、滬江大學	籃球	中鋒；左衝右突、退則抵禦有方	音樂、戲劇	身材魁偉、性情好、和顏悅色		9
倪天真		滬江大學	籃球	中鋒；矯若游龍、跳躍搶攔、滿場飛跑		身軀嬌小		9
俞大綵		滬江大學	籃球	後衛				9
張如怡		滬江大學	籃球	守衛	騎術、游泳			9
任慧		上海中學	排球	壓球巧而有勁、擅接球			曾任排球隊長	10
楊品珍		上海中學	排球	接球穩；惟氣力小，不能壓球		艷麗動人		10
黃煦	湖南	上海中學	排球	接球、壓球、發球均佳；缺點過於活潑，易搶拍				10
張建新		上海中學	排球	拍球姿勢佳、發球高而遠		僅14歲，天真		10
陳淑卿		勞動中學	籃球	前鋒；擲籃準確、敏捷、輕快		嬌小玲瓏、身材窈窕		11
詹一新	安徽	勞動中學	籃球	後衛；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體態龐然、氣力很大		11
王萃彩		勞動中學	籃球	衝鋒守衛均佳		身材高大魁梧，似男子		11
劉靜芳		勞動中學	田徑、籃球			秀氣斯文		11
何志行		勞動中學	籃球	後衛；巧伶、輕快，擲籃有素		勞中「皇后」		11
鮮于愛		勞動中學	籃球	後衛				11
施順貞		勞動中學	籃球	後衛				11
龍在天	南洋華僑	勞動大學	籃球	後衛；一夫當關，萬人莫入		談吐文雅、為人客氣；身體偉肥		12

姓名	籍貫	就讀學校	擅長運動	記者眼中的球技	其他才能	記者眼中的風采	經歷及畢業後動向	資料來源
王昌信	湖南	勞動大學	籃球	前鋒：投籃準確，拍球接球伶俐，男同學或有不及者		嬌小玲瓏、活潑善戰、所到之處無不披靡		12
邱富敏		勞動大學	籃球	勇敢善戰		美麗臉龐，窈窕身材		12
張素華		勞動大學	籃球			矮碩		12
應奮靈		國華中學女生部	籃球	衝鋒迅速、傳遞巧妙			曾任籃球隊長	13
盛淑苻		國華中學女生部	籃球	盤球靈捷、擲籃準確				13
張君直		國華中學女生部	籃球	姿態佳、投籃傳遞高人一等		活潑	曾任籃球幹事	13
顧菊林		國華中學女生部	籃球	後衛		神情似男孩		13
李志均		國華中學女生部	籃球	有高躍橫剪的技能、防衛強				13
備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安徽五中新聘體育教員沈文英〉，《申報》，1929年8月10日，增刊，頁7； 〈復旦的籃球女明星〉，《申報》，1930年3月16日，增刊，頁7-8； 〈崇德女校籃球隊的後起者〉，《申報》，1929年8月14日，增刊，頁3； 〈東南女體專幾位運動健將〉，《申報》，1929年7月2日，增刊，頁7； 〈評東吳大學女生籃球隊的球藝〉，《申報》，1929年7月27日，增刊，頁3； 〈東吳大學的四大金剛〉，《申報》，1929年7月11日，增刊，頁3； 〈愛國女學體育科畢業生〉，《申報》，1929年7月19日，增刊，頁3； 〈智仁勇女學的人才〉，《申報》，1929年7月22日，增刊，頁5； 〈滬江的籃球女將〉，《申報》，1929年7月29日，增刊，頁5； 〈上中女生排球隊〉，《申報》，1929年11月13日，增刊，頁9-10； 〈勞中的女生籃球隊〉，《申報》，1929年6月29日，增刊，頁8； 〈勞大的女生籃球隊〉，《申報》，1929年6月16日，增刊，頁7； 〈國華女生籃球隊〉，《申報》，1929年11月22日，增刊，頁5。 							

徵引書目

一、報紙、期刊

1. 上海《時報》：1927年-1937年。
2. 《大夏週報》68期-13卷5-6期，1929年12月-1936年10月。
3. 《中央日報》：1927年-1937年。
4. 天津《大公報》：1927年-1937年。
5. 北平《晨報》：1927年-1937年。
6. 《申報》：1926年-1937年。
7. 《松江女中校刊》14-35期，1930年12月-1932年12月。
8. 《德音半月刊》1卷1期-2卷9期，1932年9月-1933年6月，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102。
9. 《體育半月刊》第32-37期合刊本，1933年5月。
10. Chang Lee Chu, 'Sports Teams', 《丁丑年刊》，1937年，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85。
11. How Mo Li '21, 'Athletics', 《墨梯》，期2，1918年6月。
12. Zee Yeu Yong, 'Athletics', 《墨梯》，期3，1919年6月。

二、專書

1. 上海體育志編輯委員會，《上海體育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6年。
2. 王其慧、李寧，《中外體育史》，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 任海，《中國古代體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2版。
4. 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體育史簡編》，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81年。
5. 陶希聖，《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上海：新生命書局，1931年。
6. 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中國體育史學會編，《中國近代體育史》，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89年。

7. 曾迺敦，《女學生生活素描》，上海：女子書店，1936年。
8. 勤奮書局編譯所，《全國女運動員名將錄》，上海：勤奮書局，1936年。
9. 裴順元、沈鎮潮編，《女運動員》，上海：上海體育書報社，1935年。
10. 劉秉果，《中國古代體育史話》，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三、論文

1. 〈女生籃球隊，大勝愛國〉，《復旦旬刊》，創刊號，1927年11月。
2. 〈女籃球健將婚變記〉，《體育評論》，期81，1934年4月21日。
3. 子岡，〈北平的女學生（上）〉，《女聲》，卷3期2，1934年10月。
4. 心宏，〈江蘇省立各校第三屆聯合運動會〉，《教育雜誌》，卷8期12，1916年12月。
5. 王澤民，〈錦標前後〉，《大夏》，卷9期24，1933年5月1日。
6. 〈外人目光中之中華女子籃球隊〉，《體育評論》，期22，1933年3月11日。
7. 向勤，〈舊中國廣東的兩間體育學校〉，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市荔灣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廣州文史資料》24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
8. 〈自治會之歷史〉，《丁丑年刊》，1937年，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85。
9. 吳志明、呂權、吳健，〈陸禮華與中國女子體育運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 沈愛麗，〈課外運動〉，《鳳藻》，1937年，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140。
11. 汪桂芳，〈勗全運會女選手〉，《婦女月報》，卷1期10，1935年4月10日。
12. 〈兩江三敗東南〉，《體育評論》，期14，1933年1月7日。
13. 〈所謂浙省建設運動會（案：原記「動運會」）者〉，《體育評論》，期14，1933年1月7日。
14. 拾遺，〈今日女運動員的病態〉，《國民體育匯刊》，期1，1936年1月。
15. 洪鶴齡，〈比球〉，《石珠》，1931年，蘇州振華女子校級刊，蘇州市檔案館藏，檔號J6-1-10。

16. 秋英，〈有感於某校女生賽球〉，《世界日報》，版 6，1935 年 4 月 22 日。
17. 袁宗澤，〈江蘇省運動會史略〉，《體育研究與通訊》，卷 1 期 2，1933 年 3 月。
18. 高師三統計，〈本校學生職業興趣調查〉，《松江女中校刊》，期 29，1932 年 6 月。
19. 高梓、張匯蘭，〈中國女子體育問題〉，《科學的中國》，卷 2 期 8，1933 年 10 月。
20. 康蓮娟，〈球類比賽報告〉，《蘇州振華女學校校刊》，1933 年 4 月，蘇州市檔案館藏，甲 5-1-419。
21. 張世鑾，〈特別記事：參觀江蘇省立各學校第二次聯合運動會〉，《教育雜誌》，卷 7 期 12，1915 年 12 月。
22. 張嫻如，〈十年前拾零〉，《聖瑪利亞女校五十週紀念特刊》，1931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Q135-3-138。
23. 莊啓英，〈大學生活〉，《滬大周刊》，卷 21 期 6，1933 年 12 月 15 日。
24. 許敏中，〈嘉興中等學生生活狀況及其志願的調查〉，《中學生》，號 44，1934 年 4 月。
25. 陳碧雲，〈兩年來的中國婦女〉，《女聲半月刊》，卷 3 期 1，1934 年 10 月。
26. 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新史學》，卷 7 期 4，1996 年 12 月。
27. 葉楚，〈記處州中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麗水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麗水文史資料》，麗水，1990 年。
28. 董怡和，〈舊中國的籃球運動〉，《體育史料》，第 5 輯，1981 年 12 月。
29. 寥星，〈爲的什麼呢？〉，《女青年月刊》，卷 13 期 6，1934 年 6 月。
30. 漢公，〈體育外史（續）〉，《體育周刊》，期 2，1931 年 10 月 30 日。
31. 劉珍寶、嚴蔚雯，〈我校籃球隊小史〉，《啓秀年刊》，1939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 Q235-3-108。
32. 戴閨雄，〈師生籃球友誼賽〉，《鳳藻》，1936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Q235-3-139。

33. 〈雜俎：運動必要〉，《啓明女學校校友會雜誌》，期 1，1920 年，蘇州市檔案館藏，檔號 Q235-3-110。
34. 〈籃球名星王志新女士〉，《體育評論》，期 14，1933 年 1 月 7 日。

